



2011年5月31日6期

总第七十一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本期目录

【文革遗产研究】

[顾 土 科学与文革——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八](#)

【史林一叶】

[杜钧福 文革初北京的驱逐行动](#)

[胡庄子 “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考](#)

【口述历史】

[何兆武口述 文靖整理 “四大金刚”的不同命运](#)

【风云人物】

[魏 威 又见毛兵](#)

【文摘】

[野 夫 让记忆抵抗](#)

[杨小村 我在文革初期的红卫兵经历](#)

[何亮亮 有关邱会作的三本书](#)

【博客文选】

[泉州李四 泉州也有一处红卫兵公墓](#)

【简讯】

[穆 汀 《清华蒯大富》一书在香港问世](#)

[朝 代 文革研究的美术向度——考史堂～文革资料研究交流中心在京](#)

成立

【书评与序跋】

许爱晶 绝版的价值——《清华蒯大富》自序

【故纸堆】

新华社 我国红卫兵代表团离京前往地拉那

【编读往来】

1、卜大华澄清王任重与《造反精神万岁》的关系

2、蒋健谈毛泽东不让江青进政治局

【文革遗产研究】

科学与文革

——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八

顾 土

1978年3月18日，这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许多中国人都记得的日子：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6000多人出席，大会一直开到31日，闭幕式上，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发表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此文轰动一时，人人竞相传诵。文中说：

我们这些参加过“五四”运动的人，喊出过发展科学的口号，结果也不不过是一场空。大批仁人志士，满腔悲愤，万种辛酸，想有所为而不能为，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我们不少人就是在这种暗无天日的岁月中，颠沛流离，含辛茹苦地度过了大半生。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

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新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科学得到了解放。毛主席和周总理又亲自为我国规划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对科学事业和科学工作者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国的科学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回忆起这些情景，一桩桩、一件件的往事都涌上心头，好像就在眼前一样。饮水思源，我们怎能不万分感激和无限缅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呢！万恶的“四人帮”对科学工作百般摧残，对科学工作者横加迫害，妄图重新把我们的祖国拉回到愚昧、落后、黑暗的旧社会去。但是，“蚍蜉撼树谈何易”。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扫除了这伙祸国殃民的害人虫，使我们得到了第二次解放。现在，我们可以扬眉吐气地说，反动派摧残科学事业的那种情景，确实是一去不复返了！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郭沫若的这段话，今天看起很可笑，它前后矛盾，概念混乱，但确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认知水平和话语现状。

按照严格划分，广义的科学大致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类，但在习惯称呼里，科学往往指的是自然科学，也就是科学技术。1977年以前只有中国科学院，其中的社会科学部分称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郭沫若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可是，在郭沫若的头衔里从来就没有科学家之说，显然，他作为院长，是广义的科学院院长，而对他的成就认定却又是以狭义的科学来划分，所以，他算科学家又不是科学家。郭沫若说的“科学的春天”，实际指的是科学技术，因为科学大会主要是科学技术的大会。1978年他担任的也是狭义的中国科学院的院长，而且还继续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长。

将1978年以后歌颂为“科学的春天”，而此前的岁月，即文革十年，当然就不是“春天”，这是当时的铁定话语。可是，“春天”只是一种艺术化的形容，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比如农业和工业，如果仅仅以受重视、被关怀就算“春天”的话，那文革还真不算是寒冬？因为整个文革中间，亩产“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号召从未间断；从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到施肥、春耕、夏收、双抢等等，

一直是《人民日报》关心的话题；“农业学大寨”也是贯穿始终的口号，大寨领头人陈永贵还当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而 1975 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华国锋的报告就是“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在文革中间，钢产量既是自我夸耀的证据，也是不断宣扬的奋斗目标，从大炼钢铁开始，钢产量就是中国工业发展的象征，所谓“以钢为纲”，对钢的重视，也可以视为对工业，起码是对重工业的重视。至于科学，在文革中是不是就受到冷落或是如郭沫若所说受到了“百般摧残”呢？对于科学工作者，是否就被蔑视、轻视，或如郭沫若所称被“横加迫害”呢？其实，这是个不能以“春天”来形容的问题。

文革，对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工作者而言，应该说，是个四季交融的时代，春天般的温暖、夏天一样的闷热、秋风扫落叶那样的无情、冬天似的冷酷，无不存在，就看在什么情形下，是什么时候，针对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

神学的婢女

极端的个人崇拜是文革发动的基础，正是依赖狂热的个人迷信，文革才得以席卷每个角落。可以说，文革中对领袖的顶礼膜拜超过了古今中外，既是集大成，又达到了极致。形成这种极端型崇拜的原因有多种，但 1964 年以后有两件事情对此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一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二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上演。

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前，新中国的巨大成就主要显示在政治的预设上。被认为是“打败美帝野心狼”的抗美援朝，目的在于“保家卫国”；完成“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反右运动则是“打退资产阶级右派进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最终是“超英赶美”，逐步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其中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跃进、人民公社不但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而且还与人民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三年大饥荒的灾难性恶果却否定了这些成就。所以，到了 1964 年，值得炫耀的国家建设成绩正处于缺失状态。此时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就是说中国拥有了核武器，既是中共建国以来，也是中国百多年来无与伦比的巨大成就。尽管核武器可以为国家安全服

务，也可以为一个政权、一个利益集团、极少数当权者甚至一个独裁者的统治服务，而且核武器不能解决温饱，不等于现代化，甚至国防现代化都不是，这从半个世纪以来一些亚非国家不顾国计民生，拼命研制核武器的历史已经得到证明。但是，经受了百年屈辱且强国心切的中国人是从自己的贫弱历史中，单纯从“强大”的角度思考这一问题的，连无党无派、自由独立的陈寅恪先生都为此欢欣鼓舞，更别说一般民众了。起码在一个方面，中国可以与世界最强国相比拟，可以与美苏英这样的大国平起平坐。依照当时的政治生活逻辑和大众的思维方式，这一无与伦比的功劳当然归功于伟大领袖的正确领导了。

恰巧的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就发布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现场。《东方红》聚集了全国 3700 位最优秀的艺术家，第一次集中了当时看来最优美的音乐舞蹈，在舞台上将赞美和称颂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状态，赞美和称颂的最终就是“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正是人类历史上个人崇拜的顶端用辞，而《东方红》的本意也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1965 年，《东方红》又用进口胶片拍成了彩色宽银幕艺术片和普通艺术片，舞台的《东方红》，欣赏人数很有限，但电影却可以传遍城乡，全国男女老少从艺术化的舞台上再次领略了近半个世纪神话般的革命历史，在载歌载舞的感化中将早已植根于内心的领袖崇拜升华到了更高的层次。

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伴随着前所未有的颂扬史诗，交相辉映，在 1964 年，的确震撼人心，为领袖的绝对崇拜奠定了牢固的基石。原子弹，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当时的最高成果，但这一成果在 1964 年的最大时效，不是别的，而是强化了个人崇拜，极端个人崇拜又为文革的成功发动和顺利推进提供了保障。

就在这一年，6 月 27 日，毛泽东在文艺界整风报告中批示：文艺界各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 年来基本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7 月初，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也是 7 月，《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批判杨献珍的文章和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仍然是 7 月，《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在全国发行，全国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要求，政治理论课应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把毛泽东著作作为最基本教材；10 月，新华社报道全国各地大演革命现代戏，用工农兵形象取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在这一年全面展开。1964 年所发生的这些，正是文革的序

曲，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适逢其时，一朵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轰隆隆一声，好似开幕的礼炮，宣告中国一个新时代即将降临。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在宣布成功的声明和公报中，都在尽力解释中国为什么进行核试验，并没有在话语里将这一成就与个人崇拜结为因果，《人民日报》的号外只称这是“加强国防建设的重大成就，对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但文革的序曲奏响之后，1965年5月的第二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就成为话语主导；1967年6月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不但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还是“毛主席伟大预言的实现”。

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这一科学成就尽管已经研制了6年之久，但在1966年成功时，也在当时已经盛行的文革话语里理所当然地划归为“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1966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并说这是“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而在头条新闻的下方又用近半个版的篇幅发表社论《用毛泽东思想打开“生命之谜”的大门》，其中写道：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手中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能认识客观规律，探索自然界的奥秘，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说，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这是一个伟大的唯物辩证法真理。这个真理，既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又符合自然、社会的发展规律。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人员，从实践中认识到这个伟大的真理，自觉地进行世界观的深刻改造，因而在我国科学技术领域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杰出成就。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就说过：“如果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能够有比较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能够有比较多的

人通过工作和生活的实践，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的实践、科学的实践，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打开了“生命之谜”的大门，在探索自然界奥妙的长途中，跨出了重大的一步。广大的科学工作者，只要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在向大自然的进军中，我们一定能够解开更多的自然之谜，挖掘出无穷的自然财富。

与此相同，文革中间，无论铁路通车、轮船下海、大桥建成、断肢再植，还是超高压标准电容器、计算机、精密平面磨床、静压传动内燃机车、日全食观测、电子显微镜、杂交水稻、针灸的成功，只要是个成就，无不纳入文革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框架，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卫星的名字就叫“东方红一号”，上面播放的也是《东方红》乐曲，领袖的功绩和英名更牢牢地与杰出的科技成果结为一体。当然，这些成就反过来又印证了领袖思想的确伟大，方向指引确实正确，发动文革实在必要。

早在文革前，将成就归功于党、归功于领袖的思维方式就已经确立，这也是所有信奉个人崇拜国家的通行逻辑。而在文革期间，归功于领袖的话语更占据了绝对主导，连党也退居其次。此时的党，确切地说，已经沦落为领袖的从属。因为整个文革的话语表明，全党只有领袖一人无比英明正确，只有领袖才能代表伟大的党，没有领袖思想光辉的照耀，没有领袖全能的指引，没有领袖著作的活学活用，党根本不可能取得任何胜利和成功，科学技术与其他建设成就自然也不例外。文革的思想和实践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被彻底否定，显然，此时的领袖思想也不是后来官方所谓的“全党智慧的结晶”，只是一个人的主观意志罢了。

领袖崇拜是将人抬高为神，极端的崇拜则是将神化的人再拔高为万神之王、全能的主，文革中将有关领袖崇拜的一整套礼仪和说辞都发挥到极致，已经属于神学的范畴，这种神学内容之繁多、做法之疯狂、话语之极端、程式之复杂，不亚于古今任何宗教。科学技术在文革中始终没有脱离为神学服务的角色，领导科

学技术的人、从事科学技术的人，都自称以领袖思想为指导，都始终在学习领袖思想的生活中度过，都将自己所做的一切归功于领袖阳光雨露的滋润。科学技术对神学的自觉匍匐，在文革中显示得可谓淋漓尽致。

从核武器试验等一系列科技成就及其大规模宣传看，虽然服务于神学的地位始终未变，但在文革中间，对科技成果的重视丝毫不亚于文革前，由于这些成果都被纳入领袖思想和文革的胜利果实，所以，重视程度甚至还超过了文革以前。

特殊的待遇

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其佼佼者大多是 1949 年以后各类政治运动整肃的对象，1957 年是对精英的大扫荡，文革则是抄底。但在文革这样急风暴雨式的运动里，有些名人确实幸免于难，非但平安过关，而且还颇受重用。

社会科学界，在文革中可以继续端坐主席台的那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无不积极主动将自己所学所写所讲服务于大小政治运动，尤其是后来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让一批哲学、史学界的学者成为大批判的工具，在中共九大、十大主席台上和中央委员名单里，在四届人大主席台上和常委名单中，我们可以看见几位代表性人物的名字。这些人中大致可分几类，一是其论述基本与领袖的思想观念相吻合，甚至与文革历史观、价值观还有某种相通之处；二是不惜坚决否定自己过去的学说，竭力迎合文革的一切思潮，有人先是批判乃至批斗的对象，但后来又跻身批判的主力军；三是与领袖存有深厚的旧谊，依然可以得到最高层的眷顾，兼具其中两者的也有那么几位。当然，还有如翦伯赞那样，批斗过后本来可以顺利复出，却阴差阳错，走上了绝路。

自然科学界被打倒、被批判、被关进牢狱，以至头顶各类罪名、身陷各种冤假错案的人，在文革期间与社会科学界一样，不计其数。当时的杰出科学家有几项罪名是逃不掉的，他们都在国外留学或从事过研究，自然就有外国间谍、帝国主义特务的嫌疑；他们或曾在民国政府中任职或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所以毫无例外地成了历史反革命或反共分子；他们都是科学的精英，于是，就自然而然地与反动学术权威划了等号。这就是文革的思维方式。如叶企孙、熊庆来、赵九章、姚桐斌、饶毓泰、董铁宝、萧光琰这样的杰出科学家，其结局都很悲惨。但另有

少数精英人物，他们的文革路程却别有一种景致，这样的景致常常被人作为文革礼遇科学家、保护科学的证明。

其实，在文革中受到特殊礼遇，得到最高层保护的精英科学家也分几类：一类人从来就没有成为批判对象，而且身居高位；一类人险些受到批判和批斗，但迅速就受到保护，以后又处于显赫的位置；一类人是先遭到批判或批斗，后来又被保护起来，甚至时而被批判时而受关照。其中，有的人深受领袖赏识；有的在国内外科学界享有声誉，而且没有任何异见，始终规规矩矩；有的不但没有不满，还积极响应文革的号召、参与文革的斗争；还有的人所研究的行当属于稳固政权、显示伟大成果时最需要的那类科学。当然，也和社会科学界一样，有些人是一身兼几类。上述这几类人，我们在中共九大、十大和四届人大的主席台上，在各类国家招待会的名单中都可以见到。

自然科学界与社会科学不同的是，后者的学问本身必须彻底转变为文革的思想资源，否则研究者在文革中就没有翻身走红之日，而作为前者，毕竟不是文史哲，其具体内容与文革中大小运动所涉及的那些人物和事件不必发生直接的联系，但研究成果必须归入领袖思想胜利或文革伟大胜利的话语体系，而且研究过程也需要套上一层文革意识形态的外衣，比如靠辩证唯物主义指引、批判修正主义、深入三大革命实践、向工农兵学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

以李四光、钱学森与郭沫若相比，可以看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郭沫若尽管得到保护，没有被揪斗，免去了当众的人身侮辱，但其过去的学问却被严厉批判，连他自己也不得不公开自我否定；而李四光和钱学森不但人身受保护，其理论学说也被肯定，他们的被保护与自己的学说还结为必然的因果。

社会科学家的持论必须与文革意识形态相一致，还在于领袖对社会科学的具体议论太多，观点、看法举不胜举，指示接二连三，文革中当红的当权者也大多对社会科学存在浓厚的兴趣，有不少人还学有专长，功力不浅，而从文革前到文革中，看待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的各种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与历次政治运动又都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所以，社会科学的具体研究也很难独立，只能成为阶级斗争和文革大批判的工具。只有一个考古学，技术性比较强，跨学科的地方很多，除了考古结果可以硬被按上阶级斗争的论点外，其他方面反倒相对自主。

自然科学则不然，领袖的论述不仅稀少，并且对各学科的内容也没有具体的

说法，至于一些笼而统之的观点，从抽象的哲学角度考虑更多一些，怎么说都可以，无法干预实际的研究。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一直到文革，在自然科学界，包括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等，也曾进行了一系列批判活动，通行的叫法是“彻底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或者是“深入开展自然科学界的斗批改”，其中因苏联的“李森科事件”而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和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批判都非常著名，但这些批判大多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社会影响不是很大。其中有的批判尽管背后还有陈伯达、姚文元这种文革当权人物的支持，但由于没有得到领袖的指示，也非领袖所发动，所以，与对胡适、胡风、海瑞、《水浒传》、《清宫秘史》、“孔老二”、儒家学说的批判不可同日而语，在批判爱因斯坦时还受到一些著名科学家的抵制。科学家敢于在相对论上发表自己的见解，也与最高指示的缺失有关，假如有个最高指示在那里摆着，恐怕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

文革和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阶级斗争思维对社会现象的极端反应，按照这种思维，阶级斗争不可调和，敌我分明，不讲情面，所有的运动几乎都是只有过度没有不及的，真正做到了宁可错整一万，绝不放过一个。但是，每次确实都有例外，而这种例外常常落在自然科学家身上。这表明，事实上，政治运动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原则，现实的实用价值和最高层是否眷顾，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实用和眷顾又具有很强的伸缩性，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在 1957 年的反右运动中，中国科学院党组研究后，由党组书记张劲夫向毛泽东进言，称中国向科学进军，要靠科学家，对他们应该采取保护政策。经中共最高层同意后，9 月 8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指示》说：

对于自然科学方面的反右派斗争，策略上要更加细致，应当按照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斗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在高级自然科学家中，有一部分人，此次有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但一向埋头于科学研究工作，并有较高的科学成就，在今后还要用他们的专长进行科学工作，对于这一部分人，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分子；有些具有突出

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在国内外相当著名，平素不大关心政治，在这次鸣放中有的按其言论应划为右派分子，应由负责人找其谈话，指出其错误，但不要拿到群众中去斗；对在 1954 年日内瓦会议后争取回国的一批科学家，不列入政治排队，对他们要采取长期在工作中考察和耐心教育改造的方针，以利于进一步争取海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

按照这一“指示”，科学院系统的自然科学家在反右派运动中基本上都受到了保护。而教育界的曾昭抡、钱伟长等人，同样也是科学家，也很著名，就没能逃过这一劫；许多非常杰出的社会科学家，还有章伯钧、罗隆基等，不但是政治名流，并且在社会科学方面学有专长，却都被毫不留情地打成右派。显然，反右时期对自然科学家特殊关照是出于实用利益的考虑。

文革尽管是对知识分子抄底式的大清扫，但由于现实需要和领袖眷顾的原因，有的科学家，尤其是“两弹一星”研制方面的科学家，仍有人享有被保护的特权。这些人的具体情形也不相同，比如邓稼先，先是沦入被批判打倒的对象之列，亲人中还有因受摧残而致死的，后来又受到保护和利用；比如钱学森，蒋百里的女婿、留学美国、海外关系复杂、学术权威，依照文革通行的逻辑，从哪个方面都应该被揪出来，就如他的许多同学、同事、同行、朋友那样，可他偏偏得以幸免，不但未受任何冲击，还在中共九大那样的特殊时期当上了中央候补委员，甚至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拥有了强势话语权，其发言的积极主动超过了许多在任的党和军队重要领导以及文革红人。钱学森率先建议在宪法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彪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的内容，而这个建议后来成为林彪、陈伯达等人的主要罪证，他最终却可以安然度过，与领袖最为宠信的汪东兴享受了同样的待遇。这不能不说是实用因素更加上领袖隆恩的结果。

文革中间，对自然科学家是否保护，实用性虽然还管用，但与最高层的关系成为更为重要的因素。姚桐斌是两弹一星的中坚力量，也很实用，却被铁棍打得奄奄一息仍不准送医院救治；而钱学森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 1964 年，在文革序曲已经奏响的 12 月 26 日，却可以应邀参加领袖的生日宴会，并且坐在领袖身旁，与陈永贵等人同处一桌，成为阶级斗争、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的典型代表，所以，

他在文革中享有最优渥的待遇也就自然而然了。

文革中对一些自然科学家的关照，不仅表现在国内一些自然科学家身上，还体现在对杨振宁、李政道等美籍科学家的礼遇中，他们每次回国都受到领袖及最高层的接见，使名字和形象在全国得到了大普及，其知名度与当时的澳共（马列）主席希尔差不多。然而，任谁都应该想一想，如果他们当年也“毅然回到祖国”，而且是回到大陆，那他们的结局是钱学森呢，还是邓稼先，或是姚桐斌？

恶劣的环境

讨论文革中的科学，对立的两种意见显得都很在理，从领袖关怀钱学森，从江青关心陈景润，从周恩来保护著名科学家，从接二连三报出的科学成就，人们可以得出文革决不是科学冬天的结论，甚至还可以说成是春风不断送暖；但从姚桐斌、熊庆来等科学家的惨死，从对大量科学人才的关押、劳改、批斗，从许多科研机构业务的荒废，从学校正常教学的被打断，从各类大小运动对科学研究的干扰，人们同样也可以发现文革是科学严冬的证据。

文革中的科学状况究竟如何？其实，与当时十分重视的农业、工业一样，可以说，文革当权者的主观意愿未必是加害，但事实上，起码在多数时候，又确实让人感觉如严冬一般寒冷。

任何一种统治，无论于私于公，恐怕都不会蓄意地破坏生产，或者故意陷人民于贫困之中。三年大饥荒不是谁有意造成的，当初大跃进的目的也是为了加快生产，可是，这种跃进方式，加上那样的社会制度，必然导致全国一起闹灾荒，一同挨饿。文革的发动者也想通过文革促进生产力的解放，所谓“抓革命促生产”，可事与愿违，严酷的阶级斗争不可能促进生产，不但严重干扰了工农业发展，还激烈铲除了任何一点经营生产的自由，摧残了人的生产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且，文革并没有改变文革前就已经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形式，还强化了这种体制，结果，文革中一切物质都处于极其短缺的状态。人民感触最深的就是日用品始终高度匮乏，什么都由票证加以限制，连花生、瓜子、香油、鸡蛋、豆腐这样的传统小农经济的长项竟然只有在节日里才能限量供应。

任何一个政权，为了权力的稳固，为了维持社会的基本供给，都不会有意阻

挠经济的发展，并且，即使没有良好的制度，生产本身也有其自然的推进力，人也有其天然的进取心，管理者更有其不能回避的督促义务，但错误的政策往往妨碍了这种推进力、进取心和督促义务，阻碍并不见得一定是降低或停滞，缓慢也是一种严重的阻碍。文革正是如此，增加工业产量和粮食亩产是各级权力机关的任务，宣传中更是不遗余力，所以，当社会稍微稳定以后，生产转入正常，工业产量有所提高，农业产量有所提升，都是理所当然的，但因为制度、政策和环境的原因，这种进展十分缓慢，而且比例严重失调，缺少生机和活力。

重视，在我们的习惯话语里就是关怀，但如果制度、政策、体制都是错误的话，那么，越重视越有害。当计划经济体制和人民公社大锅饭带来无穷的弊端时，重视或许正是强化，强化的后果当然就是适得其反。所以说，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否发展，人民生活可否提高，不在于当局重视不重视，关怀不关怀，号召不号召，而在于有没有优越的制度、合理的体制、良好的环境、推动发展的政策。改革开放前，天天自吹钢产量，月月喊粮食亩产“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年复一年叫嚷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可事实如何呢？极度贫困始终是我们生活的基本面貌。改革开放以后还没几年，政策一变，人民公社一取消，钢产量、亩产量连提也不提了，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来临，钢产量还大量过剩，亩产量更不用再发号召了，人民生活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高度集权和个人专制给文革前的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灾难，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引起的大饥荒最为典型，而文革中这种集权和专制更为严重，不同意见、不同的思考都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被扼杀，任何持有不同观点的人都会受到批斗，背负罪名，或者投入监狱，直至丧失生命。在一个不允许有任何异见的国家里，其决策错误只能一犯再犯，这恰恰是对生产力的最大压制和破坏。

文革中间的科学状况也是如此。当权人物，包括领袖，事实上都非常重视科学成就为自己的统治、为文革带来的荣耀，而且文革的发动者与拥护者还会自认为文革才是推动科学繁荣的动力。除非存有个人恩怨，权力的最高层还不至于有意陷那些杰出的科学家于绝境之中，让他们非死不可，为了两弹一星等实用目的，更不可能愿意让姚桐斌、赵九章这样的人丧命，周恩来听说姚桐斌被打死时还十分震惊。但是，文革的发动和进行，文革的思维 and 理念，文革的方式方法，加害于科学和科学家是一种必然。按照文革时兴的话说，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的。比如：对知识分子歧视、怀疑的阶级斗争思维，使文革中的科学家自然而然就成了整肃、批判、打击对象，即使最高层想保护，也只能保少数，所以在两弹一星的元勋里依然有人死于非命。比如：科学精神与文革思维的天然对立，使得科学研究不得不备受文革干扰。华罗庚是领袖赏识的人，还到工农兵中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经常深入生产第一线，即便在文革中他的知名度也很高，电影院放映过关于他的科教片，并且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但他依然逃不脱时常被批判的命运，每次都需要最高层出面保护才得以过关。

整个文革，运动不断，每场运动都是与知识和教育过不去，没有像样的大学当然也就不可能培育科学的后继人才，不尊重知识的环境里，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自然很差，无时无刻的运动必然冲击科研工作，大量中青年科技人才也不会专心致力于科学事业。袁隆平的成就虽然诞生在文革期间，但这是因为他受到保护、暂时避开政治运动的结果，如果依照文革的逻辑，凭他的出身和“白专道路”，本应该是遭批判的，而事实是他也险些遭受批判。陈景润因江青等人的关怀而改善了生活与工作条件，但这种恶劣的条件正是文革与文革前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知识分子带来的后果。面对文革，吴有训、竺可桢、茅以升、贝时璋等人尽管被保护，还经常见报，登上主席台，但他们无法进行正常的科研，而且看见周围的亲友、同事、学生纷纷身处险境，或是非正常死亡，心情也不能不受到伤害。周培源在文革中的遭遇更能表明问题，他不但一直没有被打倒，而且在文革初期那样的险境里还能参与两派斗争，继续担任领导，始终受到最高层的保护，但是，文革对他的危害几乎是等同的。

文革是分为阶段的。初期最为凶险，对科学的毁坏也最大，只有极少数科学家被保护，大多数人难逃一劫。林彪事件发生后，尤其是邓小平等人复出，整顿成为重点。社会运转常常有意或无意地背离了文革轨道，此时的经济和科学环境有所好转，产量上升，成绩增加，科学家的环境普遍改善。但这是对文革的调整，有的甚至是对文革的反动，最终还是被定为右倾翻案风和资本主义复辟。

文革后期，尽管运动依旧不断，批判一浪高过一浪，但社会毕竟相对稳定，如文革前期那样大规模人身伤害的事情减少了很多，在这样的环境中，许多仍可以工作的科学家对科学素来怀有的追求也促成了一些科学成就。所以，在文革中，科学成就、科学家的境遇，必须认清发生在何时何地，与文革主旨是一种什么样

的关系，究竟是文革的产物，还是反文革思维的成果，是文革以前就已经开始的研究，还是文革中避开斗争风云的果实。

总之，不能将文革看作一个笼而统之的整体，认定凡是发生在文革期间的东西都归功于或归罪于文革，否则，无论看文革中的科学家还是看科学成就，都不会得出接近事实真相的结论。

2011-5

【史林一叶】

文革初北京的驱逐行动

杜钧福

文革初期将成份不好或不可靠的人驱赶出北京及其它大城市的行动，其实起源于文革之前。1961年，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提出要将北京办成“玻璃板、水晶石”，对敌情了如指掌。有人认为这包含着将“阶级敌人”驱赶出北京的意思，还认为文革中的驱赶行为和彭真的话一脉相承。当然，文革一开始即被打倒的彭真不可能参与文革初期的驱赶行动。这种貌似荒谬的事情似乎说明了一个道理：文革是中共作为一个整体长期“运动”的结果。

这种驱赶行动确实早就进行过，例如当时尚在北京的中国科技大学：“六十年代初，北京市市长彭真和公安部长罗瑞卿决定把北京变成一座没有‘阶级敌人’的‘水晶城’，下令各单位和居委会把各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清理出北京。科大青年教师中，不少人是从中科院各研究所和其他单位调来的‘政治处理品’，包括在‘反右’等政治运动中受到处分，内控‘右派’等各种有‘政治问题’的人。接到上级命令，科大也清理出一百多名教师，准备调到外地。”（戴开元、华新民《刘达与科大》，天益网，2008）如果科大一个学校就要清理一百余人，北京市所有单位要清理的人数就很惊人了。后来科大的刘达校长抵制了这一处理，但不会每一单位都有这样的领导。

这种驱赶行动一直持续到文革前夕。例如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夏秀蓉老师，她

的丈夫于 1957 年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山西劳改。到了 1965 年，根据一项中央文件，她作为右派家属，被迫携家迁往山西。（夏秀蓉《永不忘却的纪念》，2007）

这样的处理不仅在北京进行，重庆的吴宓在 1964 年 10 月 24 日日记中记载：“至 2：30 至中文系全体教职在文娱室聚聆苏鸿昌副书记讲说目前阶级斗争加严，教职员之家属及亲戚中，其本人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者，必须速即回乡，不能续留住学校内。此令立应遵行，云云。”（《吴宓日记续编》第六册 387 页，转引自何蜀《吴宓与家务女工》，《往事》第 62 期，2007 年 9 月 11 日）

对“犯错误”的高级干部的处理

在文革开始之前，处理不可靠人员的行动实际上是从处理“犯错误”的高级干部开始的。

1964 年以后加紧进行备战。1965 年 4 月 12 日，中央发出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9 月，中央工作会议同意第三个五年计划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方针。“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考虑到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毛泽东认为彭德怀、黄克诚、习仲勋等人不宜留在首都，遂提议把他们挂职下放，分配到外地去。”（林蕴辉《毛泽东为什么派彭德怀去三线》，《炎黄春秋》，1998 年第三期）

在 1959 年反右倾中受处分的彭德怀在京郊赋闲几年。1965 年 9 月 11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乔明甫，代表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同彭德怀谈话，告知中央决定派他去大三线任第三副总指挥。彭德怀没有接受。随后彭真向中央报告彭德怀的意向。9 月 21 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又写了一封短信，请求允许他到农村去。23 日，毛泽东接见了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也在座。在他们劝说下，彭德怀接受了任命，于 11 月 28 日启程去成都。（彭德怀传编写组《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另一主将黄克诚在这几年也是闭门家居。1965 年 9

月，杨尚昆代表毛泽东，安子文代表中央组织部来看他，宣布派他到山西当副省长，要求尽快离开北京。黄克诚问，可以过了节走吗？答曰不行。这使黄“略感奇怪”。（黄克诚《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

1965年11月，中组部长安子文找1958年被批判的谭政大将谈话，传达中央的决定，任命他为福建省副省长，并要求他全家在年底前去福建到任。他说，此次是中央对你们工作调动做出的决定，“彭德怀到大西南三线担任副主任，黄克诚去山西省担任副省长。”明确将他和彭、黄放在一类。（乔希章《谭政大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谭政在1959年并非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成员，但是在1960-1961年因“不突出政治”受到批判，又被解除了国防部副部长的职务。

杨国庆事件

1966年春，就在文化大革命紧锣密鼓准备之时，在北京这个要害之地，又发生了杨国庆事件。杨国庆是一位19岁的青年，顺义县人，当时住北京城内。他的父亲当过伪乡长，据说有人命，在1953年被判处死刑。他本人在1965年又卷入一桩“反革命集团案”。邓小平说他是个中学生，但实际上可能是个体力劳动者。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受过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很可能的。总之，他誓与当时社会为仇，于4月19日在东安门大街友谊商店内持刀砍伤两位外国人：马里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团长特拉奥雷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马罗的夫人。在作案前，他服了毒药，但后来被救治过来。

可能是因为当时北京市公安局正在公安部长罗瑞卿倒台之后“换班”，这一震动中外的大案直到局新领导上台才宣判。6月13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宣判大会，当场宣判杨国庆死刑，照例当场执行。次日报纸上登载了这一消息。

1966年6月20日，陈毅在越南驻华大使的招待会上说：“面对着这场大革命，一小撮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还在作着垂死的挣扎。不久以前，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分子杨国庆砍伤国际友人的案件，就是这种垂死挣扎的反映。今天，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无比地强大和巩固，任何反革命分子胆

敢进行阴谋破坏活动，一定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反革命罪犯杨国庆已经得到应有的惩罚，他蓄意破坏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友谊的罪恶企图完全落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是任何反动势力破坏不了的。”

将各种不可靠的人员大规模清出北京应是蓄谋已久的，但杨国庆事件的发生肯定加速了这一措施的实行。

首都工作组

1966年5月底，为了保证首都的安全，首都工作组成立。其职责实际上是在备战的背景下清理内部。

说是备战，实际上在认识上已接近临战。当时我在北京郊区作为工作队员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春，工作队传达华北局指示，叫尽量多种成熟早的夏收作物如豌豆，仿佛等不到秋天就要打仗一样。我们当时殊为不解，不知道要和谁打仗，最近读沈志华主编之《中苏关系史纲 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才知这个时期正是中苏转入政治、军事对抗的转折时期。1966年1月份，苏联和蒙古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构成了对中国的直接军事威胁。这一事实结合苏联增兵中苏边境，使中国领导人明确做出针对苏联的备战部署。3月16日，周恩来在华北局天津会议上说，“华北可能是敌人的主攻方向，华北要作为主战场。”“备战、备荒，具体到华北来说，就是要建立战备体制。”3月底，毛泽东接见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时也谈到苏联可能进攻中国问题。

当时还在驻守北京附近部队内服役的年大六先生也说，“实际上首都工作组是处于临战状态的准备打一场北京卫戍战役的指挥机构”，其办公室主任王尚荣是当时总参作战部长，副主任雷英夫是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年大六《特别回眸之二：文革“首都工作领导小组”探秘》，大樗树下，2006）

知道了这样的局势，就可理解首都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了。“叶剑英亲自带领史进前等勘察北京地形，调派部队守卫，还部署将部分有问题的人迁往外地安置。”（郝在今《史进前将军和全军落实政策工作》，《大地》，2002年21期）

吕荧之死

据被打为胡风分子的作家牛汉回忆：“5月底，北京市委下达文件，要求三天内将社会上‘各种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人’都集中看管起来，6月初，经公安部批准，以‘胡风反革命分子影响社会治安’为名，将吕荧‘收容并强制劳动’。”他先在良乡一个叫做北京市公安局268的地方囚禁，后来转到北京清河劳改农场（即茶淀农场），备受欺凌，1969年3月5日在冻饿中惨死于此。（王俊义、丁东编《口述历史》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979年公安部给吕荧平反昭雪的批示中，也承认公安部于1966年6月对吕的处理是错误的。

吕荧是一位美学家，原人民文学出版社特约翻译员。1955年批判胡风时，他公然在批判大会上为胡风辩护，于6月19日被隔离审查。一年后，“查明他没有参加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活动，经中央十人小组研究批准，解除审查。”继而在1957年12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说明他不是胡风分子，并发表他的学术研究文章《美是什么》。

见过吕荧的从维熙描述这位美学家在劳改农场的情况：“但是这里不仅仅是寒冷，还伴随着饥饿，本来身体就不好的吕荧，形神枯槁得如同叫花子一般。在好天，他唯一的去处，是蹲在墙根下晒太阳；到了大风吼叫的日子，他身穿着麻包片般的褴褛衣衫，躺在土炕上等死。”（姜葆琛《冬天的回忆——记美学家吕荧之死》，《人民日报》，1983.05.27）

而胡风本人，在1966年的春节过后被勒令阖家迁往成都。在这之前，他在被关押10年之后，于1965年底被判刑14年并提前“释放”，刚回到北京的家。

对在押的敌对分子的处理

既然吕荧这样的经中央确定不属于胡风分子、在《人民日报》上恢复了名誉的美学家都被如此对待，落得如此下场，那些法定的“阶级敌人”，特别是在押的犯人和劳改、劳教人员就更不用说了。

著名右派分子葛佩琦当时在北京监狱服刑，因病住在监狱病房。“1966年6

月‘文革’开始，清理政治环境，把‘地富反坏右’赶往外地的北京市当局，于8月6日夜晚，把葛佩琦等五百多名‘反革命’人犯锁进闷罐子火车，押送到大同以北、雁门关以外，山西省第四劳改支队管辖的大青窑煤矿。由于他每挪一步都要借助于双拐，在必须下窑的煤矿中等于是个废人，同时塞外气候寒冷，也不利于他的健康的恢复，劳改支队的贾政委出于革命人道的考虑，派人把他送到位于太原的山西省第一监狱。为此贾政委后来遭到批斗，被调离了劳改支队。”（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257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他被监禁在山西近十年，直到1976年初，他这个作过地下工作的老共产党员才被当作“国民党战犯”释放回京。

这批从北京监狱送往大青山煤矿的“罪犯”的命运都非常悲惨。原北大数力系助教任大熊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因翻译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被划为右派分子，在1960年因“叛国投敌”被判处无期徒刑，也是这一批被送往山西大青山煤矿的。他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因“组织反革命集团”案而被害。另一被判处15年徒刑的“反革命犯”莫兴龄医生于1969年4月4日死于煤矿狱中，离他刑期到期只差17天。告诉他家属的死亡原因是“自杀”。（王友琴《文革受难者》）

1966年9月份，大右派储安平失踪了。关于他的结局，至今仍扑朔迷离。有人说他被红卫兵打死，有人说他蹈海而死，有人说他出家当了和尚。当局对他的下落的追查不是出于关心他人身的安危，而是怕这位大知识分子搞破坏。其子嗣回忆：“到了9月20日，中央统战部下达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国庆之前找到储安平，‘以确保首都的安全！’于是九三学社派了一名干部(中共党员)，并要求我和我二哥协助。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东、西城街巷转了好几天，查访了过去与父亲曾有来往的朋友们，却毫无结果。”（储望华《父亲，你在哪里？》台湾《传记文学》第55卷第2期）

由于上述事件涉及到吕荧、葛佩琦、储安平这些名人，才保持了一鳞半爪的记忆。至于更多的非名人的不幸者的悲惨遭遇，可能永远无法知道了。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我们相信是无辜的，正如上述几个名人一样。

清理无业人员：支边

无业即失业人员当时被称为“社会闲散人员”，为非单位人员。当代中国社会是个“单位”社会，政府在单位内有领导地开展政治运动、组织政治学习，依靠党、团员积极分子监控所有成员在 24 小时内的活动。但是对于非单位人员，政府则鞭长莫及。虽说有街道办事处管理，但那里都是些家庭妇女，难于贯彻无产阶级专政的意志。这些人未经政治运动的教育，单凭他们无业这一点就会对政府不满。像上文提到的杨国庆，可能就属于这一群体。后来首先和红卫兵作对的，也是这样一些人。文革初，在当局看来，他们也是一种不稳定因素，最好的办法是清理出北京，而且离得越远越好。

但是这些人员大多是些没有前科的老百姓，没办法将他们直接送到监狱和劳改场所，况且那些地方也未必有足够的条件安置，所以采取“先礼后兵”、外松内紧的办法，动员他们去“支边”。

在文革前几年，每年都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来北京招工。当年北京市公安局即承办此事，在待业青年中宣传、鼓励到新疆支边。当时把新疆的条件吹得天花乱坠，说每年可回来探亲一次，在兵团一律按部队待遇，“冷发棉，热发单，不冷不热发衬衫。”当时的无业青年，不管有无前科，在北京均生活困难且遭受歧视，希望命运能有所改变，所以有很多人报名。当然这种动员也有半强迫性质。在这批青年中，部分是已被强迫劳动的。这是一种较劳动教养轻的处理方式，适用于微小的错误如小偷小摸之类，但材料也进人事档案。另有很多是毫无错误的。

1966 年 8 月 10 日，第一列载有一千多支边人员的专列从北京一个小火车站开出。车停河南新乡，有人下车购买西瓜，因为未携带刀具无法分食，要求买小贩的刀遭拒，由此引起口角，并与维持秩序的警察冲突。他们又从当地警察的口中得知，地方上早已对他们严阵以待，因为被告知他们都是劳教人员，当即引起这批人员的强烈反应。因为他们都是作为光荣支边人员，胸带大红花，敲锣打鼓送上车的，现在感到被欺骗，十分愤怒，致使冲突升级，发生斗殴。于是当局调来军队包围列车并架机枪相向，将全体人员驱上车，一路武装押送至新疆。此事定性为新乡反革命事件。抵新疆后，十余名带头闹事分子被逮捕判刑。

第一批人员因祸得福的是，原来拟将他们送南疆，现在看他们太不可靠，

就将他们卸载安置于吐鲁番，离北京近了一些。后几批人员仍去南疆。

因为这批人原来就不被信任，又发生新乡事件，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处于最底层，受到种种歧视和迫害。原先许诺的待遇全不兑现，住在地上挖的地窝子里，不御风寒，被迫在地下挖煤或从事其它危险劳动，倍受艰辛苦难，一直在新疆生活了几十年，少数人在晚年才得以返回北京。（据当事人叙述）

“西公”专案

葛佩琦、储安平都是大右派。吕荧虽说什么也不是，但他公开为胡风分子辩护过。这都是明面上的阶级敌人，多数已关在大墙内，除非打仗，不怕他们造反。但是对于那些暗藏的“敌人”，特别是暗藏在单位内部的“敌人”，甚至于暗藏在要害部门的“敌人”，如何识别和清楚呢？这些人岂不是更危险吗？

根据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发出来的材料，在1966年6至7月，在很多单位里，结合对群众造反运动的“反击”，传达和执行过一项代号“西公”的专案，旨在清理单位内职工中的不可靠分子，部分送往山西五台或江西上饶。这事十分诡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和上下级单线联系。（详见拙文《文革初期的“西公”专案》，《记忆》2009年13期）

如果毛泽东没有回北京转折运动方向，“西公”得以执行，其涉案人数极大，造成的后果难以想象。

红卫兵的驱赶行动

1966年8月份，红卫兵运动兴起，在前期“破四旧”中，已有红卫兵自发将“四类分子”驱赶回乡。于是有关部门因势利导，策动成立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发布第四号通令，勒令“五类分子”加上资本家，“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地、富、反、坏、右、资）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

延长),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根据官方统计,在1966年8~9月,北京有85198人被轰回原籍(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1967年3月3日,周恩来在批判张仲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新疆军区副政委)的总结会上说:“去年六月首都工作组本来想把首都搞得安静一点,来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当时有个问题,首都工作组将一些人清洗出去,特别是黑户口和机关一些过去有问题的人……”首都工作组的这个决定可能是该组5月26日第一次会议上决定的。周恩来在这里说要清洗的有两类人:一类是“过去有问题的人”,实际上是将迫害范围从已确定的敌对分子无限扩大,因为经历次驱逐,北京市内法定的五类分子已不多了;另一类是“黑户口”,在叶剑英1966年9月25日讲话中说的是“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指的就是独门独户的院,一般来说,都是中等以上人家,有一定社会背景。为什么要清洗这些遵纪守法的户?叶说得明白,就是因为“谁也没有进去过”,怕坏人在里面“捣鬼”,一句话,无法监视,所以早就统计好了,就等红卫兵动手。因此,尽管在“红八月”里,“西纠”的通令中针对的是“黑六类”及其家属,但实际指的就是上述两类人员。在王友琴辑录的这一时期的受难者中,哪一个是货真价实的“黑六类”?就是因有反抗行为而被打死的李文波夫妇,也不过是个“小业主”。

以上几方面问题,现有材料零散不全,真相仍待查清,但联系起来看,确系一个计划周全的“系统工程”。它在估计可能发生战争的前提下,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夜或初始阶段,将所有几类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员——“犯错误”的高级干部、社会上的敌我矛盾人员、在押罪犯或劳改分子、社会无业青年、单位内的异己分子、包括“资本家”在内的“黑六类”、无法监视的“黑户”——分别使用最恰当最稳妥的手段予以驱逐,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其中除“西公”专案外,均顺利进行。红卫兵在这一行动中所起的作用,显然是事前未估计到的。但是毛泽东对红卫兵“破四旧”行动的支持,是否已包含特定的目的?

【史林一叶】

“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考

胡庄子

“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这是文革中 1967 年至 1969 年间逢会必呼的颂辞。有人说：搞明白“万寿无疆”与“永远健康”的区别，中国的政治你就已通晓大半。

这里，说说“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这个专用颂语。

林彪在抗日战争前期受伤，影响了身体健康。建国后，身体一直不太好，怕风，怕光，怕水，总之是弱不禁风的样子。对于一个不太健康的领导人，祝愿他“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也算是针对性很强的。

刘亚洲的《广场精神》记述：一天，毛泽东、林彪等到人民大会堂观看文艺节目。台上台下响起一片激越的山呼：“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毛泽东听了，用胳膊肘碰了碰林彪，笑着说：“下面该你啦。”果然，话音刚落，山呼又起：“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刘亚洲《广场——偶像的神坛》第 224 页）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回忆说：1967 年夏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和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看革命样板戏。戏开演前，台上报幕员高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当喊“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时，毛泽东转过头对林彪说：“你听，喊你呢！”林彪未说话，微微一笑。

上述两文讲述的同一个情节，应该发生在 1967 年 6 月 16 日。新华社在 6 月 16 日的一则报道中说：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今晚观看了上海京剧院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演出开始时，一位报幕的演员走到台前，激动地高声颂道：“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林彪不同意“永远健康”这个祝辞。6月16日晚上看完演出，他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写信，信中说：“近一个多月来，我看了三次演出，每次演出中，都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这两个口号并提的情况。我认为‘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个口号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为了在党内、国内、国外突出毛主席的伟大作用，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只有突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符合于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观实际，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盼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今后注意掌握这一点，并希望将我这封信转发到县团级，由他们传达到所有的基层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494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10月编印）

王力回忆说：林的信，文革小组不同意发，毛主席也说不能发，林彪不听，一定要发。我对叶群说，最高指示怎么不执行？她说这是林彪职权范围内的事，不要请示主席（《王力反思录》第725页）。6月30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的信。

1967年12月13日，林彪给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写信（发至部队团以上单位、地方县以上单位），他要求：“一、不要在街上和刊物中宣传‘树立林副主席的崇高权威’的口号。二、不要出我的语录和文集。三、戏剧、电影、小说中不要有叙述我的革命历史和事迹。四、不要呼喊‘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五、最近各地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要求我题词的很多。鉴于最近一次题词引起了个别地方两派的纠纷，因此，一概不再题词了。六、……”（《林副主席的一封信》，《湖南简讯》第55期，1968年1月3日，《湖南简讯》编辑组编）

林彪这两封信发向全国后，在更大范围传播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这一颂辞。随后，连偏僻的乡村小学都喊起了“永远健康”。

我上小学时，每天上课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起立，面对黑板上方墙中央张贴的毛主席像祝愿，辞曰：“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有一天，我们刚喊过“永远健康”的话，学校组织开会，校长面目严肃地传达中共中央文件，说是林彪叛逃了，

并且是许多天以前叛逃的。惊惶之余，我等几个小学生悄悄议论：他叛逃这么长时间了，我们还在为他祝福，真反动啊！老师听到了，说：“小孩子，不知不为过。”

长大后，我常常想起“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这句话，并在阅读中寻找它的最早出处。

1967年6月16日，人民大会堂演出中报幕员说：“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以她的身份，她不可能是这个颂词的首创者。

在1966年5月至1967年2月的文献资料中，没有见到“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的话语。到目前为止，我见到这句话最早出现在1967年3月18日《山西省革命组织代表会议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上。

当时，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召开成立庆祝大会、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开某些庆祝、纪念大会时，都要给毛主席党中央发致敬电，致敬电的最后都是三呼毛主席“万寿无疆”。惟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致敬电与众不同，最后多出一句祝愿林彪的话：“让我们怀着万分虔敬的心情，祝愿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并祝愿您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了这封致敬电。此后，在中央报刊上就时常见到“永远健康”的颂辞了。新华社关于1967年“五一”劳动节活动的报道中，正文和提要都赫然用很大的字体写着“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愿林彪同志永远健康！”

文革后一些回忆文章说：1966年8月，红卫兵高呼着“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口号，到处掘牛鬼蛇神的墓。有的说，“红八月”的辩论会上，红卫兵在自报家门后，也要高呼“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的口号。这显然是空想出来的情节。

【口述历史】

“四大金刚”的不同命运

何兆武口述

文靖整理

当年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由侯外庐先生负责，和其他室不同，我们不是个人研究，而是“集体作业”。组织上明确交代我们来做侯先生的助手，主要的理论框架都是他的，而且已经建构好了，我们的工作就是找材料来填充，所以他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我是年纪最大的，刚来的时候三十五岁，其他几位都是二十出头的小青年，叫做“实习研究员”。后来又招研究生，前前后后大概有七八个人，也帮着干点活儿，但主要是来进修的，再往后就是文革的那批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

那时候，侯先生有四位得意门生：张岂之、李学勤、林英和杨超。我听组里的一位老先生说：“我们组有四员大将：林英的组织（林英是党小组长，负责组织工作），张岂之的文章，李学勤的材料，杨超的理论。”这四位是侯先生最得力的助手，学问都好，都聪明能干，除了杨超自杀外，其他三位现在都是大名人了。

确实，侯先生在挑选人才方面很有眼光，他带的年轻人不仅一个博士没有，有几个连学历都没有。李学勤只在清华哲学系念了几个月，林英大学没毕业，杨超也只念了一年大学，可是侯先生看他们有才，就把他们吸收进来，这和现在的体制大大不同了。这四位才子也的确做了许多工作，《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主要就是他们的功劳，最后由侯先生统稿。不过文革开始的时候批侯先生，这“四员大将”也被贴了大字报，变成“四大金刚”了。

杨超给我的印象非常好，他搞的佛学在当时全国几乎没几个人懂，可称得上是绝学了。学问好，为人好，德才兼备，非常难得，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认真。杨超喜欢钻研马克思的理论原典，在这一点上是继承侯先生的路数，真正研究马克思的原著，真诚领会上面传达的精神。别人可以跟演戏一样随风转，他却来真格的，每次发言都是肺腑之言，比如有的人挨斗时在台上说自己“罪该万死”，他是绝不会这样说的。另外还有一点，杨超患有神经病——所谓天才，无非就是脑子比别人都灵，也许表现出来就是神经病。

这里说两句旁的话，我们研究室有四个神经病（比例似乎高了些），其中一个研究室副主任高全朴，他是军队复员来的老革命，据说他的病是延安整风落下的。70年代，有一阵子我们天天到北京摩托车厂劳动，一天他突然在车间里自言自语起来。因为只有我和他两个人，起初我并没在意，后来他的声音越来越大，而且不讲中文，但也听不出是哪国文，于是我就知道他犯病了，赶快叫别的

同志来。看到自己的同事来了，高全朴瞪着眼睛问：“你是谁！”人家说，我是某某某，他大嚷起来：“不对！你老实交待，你是谁！”于是大家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杨超的病和他不同，大概是先天的，不犯病的时候脑子比任何人都好，读书、写文章常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犯起病来就不知所云。

我和杨超家的关系很好，而且两家离得很近，走路用不了十分钟，彼此经常串门聊一聊。有一次我对他说：“文革今后怎么样，谁也不知道，也可能我们就在一起了。作为临别赠言，我要劝你两句，我以为你不适宜做一个职业的政治活动家，千万不要把自己陷得太深。”解放后的历次运动杨超都真诚参与，对马克思主义是认真对待。我相信他不是做政治投机的那种人，包括文革一开头参加造反派也是真心的，但有时候实在难以分辨谁对谁错，别人的话是真是假也很难说，何必搅在里边？所以我的态度是能躲就躲，劝他不要参加那些运动，可是他并没有听我的意见。抓“五一六”的时候，凡被点到的几乎没有不承认的，可他就是不承认，是极少数中的一个，而且拒绝交待别人，写了一张纸条：“我不是‘五一六’，我不知道谁是‘五一六’。”自杀了，年仅三十九岁。

杨超的死给我触动很大。社会进步自然有一个淘汰的过程，择优汰劣，可是我们正相反，德才兼备的往往做了牺牲，反复无常的人倒得其所哉。比如历史所有个人坦白，说自己画了中南海的地图，准备挖地道进去搞破坏，这样的人倒被表彰，而且后来做了政协委员、政治学所的副所长，这岂不成了社会的反淘汰？如果一个社会要以牺牲优秀者为其进步的代价，就未免太残酷不仁了。

林英是老党员，解放前就是地下党，当时是我们党小组的组长。文革一开头，中央文革扶持造反派，到处造当权派的反，凡作领导的都跑不了，所以他是我们室最早被揪出来的，不但因为他是“侯外庐的大弟子”，而且是历史所党委书记尹达下面的“八大金刚”之一。这“八大金刚”还包括林甘泉、郦家驹、田昌五等等，大概都比我小四五岁，不仅都是党员，而且大多是党委成员，是真正当权的人。林英两边都占着，所以后来我笑他是“双料的金刚”。记得干校回来的时候，我看他办公室的书架上空空如也，只有一个大帽子和一个牌子，都是斗他的时候戴的东西，就问他：“你还留这个做什么？”他说：“我现在想开了，无非就是戴帽子、挂牌子，指不定哪天还用得着。”就是说，反正我已经戴了帽子，将来不过如此，无所谓了，再也不必处处小心谨慎。

林英是个性挺强的一个人，往往和别人的关系搞不好，组里很多青年对他的印象不好，认为他官僚架子十足，做事主观，态度也不好。后来政治学所成立，林英调去做副所长，和所长严家其的关系搞不好，又调到宗教所任副所长，和所长任继愈的关系还是搞不好。不过在我看来，林英有个很大的优点，从来不造谣，哪怕观点是错误的，但他从来只说真话，这就很难得了。所以我倒和他很要好，相处二十年，彼此什么话都说。

另外还有一个冒怀辛，他是冒辟疆的后代，他的祖父冒广生是民初有名的名士，所以冒怀辛的旧学根底在我们历史所同辈人中是最好的。有一次他跟我发牢骚说：“怎么这些人（指所里的某些青年）什么都不知道，连钱谦益都没听说过！”我劝他说：“时代不同了，你是世家子弟，你知道的别人未必知道。……反过来我问你，《金光大道》你知道吗？”文革时期书很少，浩然的《金光大道》是当时最有名的一部小说，很多青年都在读。我虽然没读过，但至少知道有这么一本书，冒怀辛比我小三岁，可是他连书名都不知道，我就以此劝他。

所里其他同事上班不是很严格，只有我和李学勤几乎天天上班，天天见面。不过我和杨超、冒怀辛、林英的交往更多一些，也更友爱，因为我知道他们不会出卖我，彼此都没有警惕。李学勤比我小十几岁，自学成才，非常聪明的一个人，跟风也跟得紧，这一点很难做到。比如运动里几乎人人挨整，林英被整，杨超自杀了，张岂之回西北大学也被整得很厉害，唯有李学勤没有挨过整，这是非常少见的。聪明是李学勤的一大优点，可是他的缺点也在这里，聪明过甚，思想变得太快，往往也就没有自己的思想了。所以我想，他的思想改造应该是相对容易的，比如有一件事情，如果换作我，我是做不出来的。那时候，李学勤是批判组组长，他把顾颉刚先生的日记都看了，掌握材料非常详尽，然后作为罪状拿去批斗。可是江青倒台后，他第一个站出来贴大字报，而且他不说自己拥护过江青，而是骂历史所的领导为什么反江青一点都不着力等等，那姿态，好像他是一贯反江青的。

后来李学勤离开我们室，自己去搞先秦史，现在是首席科学家了，当然，对他的争论也非常之多。我以为，他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所以能够一帆风顺。说到这里，我又要为杨超惋惜起来，他就是太认真了，也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难道你就看不穿？

【风云人物】

又见毛兵

魏 威

按：“毛兵”——“毛主席的红卫兵”，这是文革中的时髦名字。文革中给自己起这类名字的人不少。本文所说的毛兵，则是文革中上海的风云人物：“中串会”的小理论家戚伟堂。中串会（中学运动串联会），是上海中学生中一个稍具异端色彩的松散组织，毛兵为它写的《一切为了九大》只不过稍稍表现出一点独立思考，一发表就遭到张春桥、徐景贤等人的批判。以后，这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们又自愿去到艰苦的兰考农村插队落户，边劳动边读书边思考，组成一个“民间思想村落”——当年还是小弟弟的朱学勤，就曾追随他们，结识了这些让他终生难忘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每次聚会几乎都要提到毛兵，关于他的消息也是断断续续的。最初听到的是他出狱了、平反了，在上海市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当了名资料员，以后则是他的哲学思考获得了复旦大学哲学系的严北溟教授的欣赏，将女儿嫁给了他，还生了个儿子。于是大伙儿便庆幸他劫后余生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但后来的消息就不那么好了，似乎精神有点问题了。据说他发病时常常会到离他家很近的三角地花园作关于老毛的继续革命理论的演说。再后来，便听说了他离婚了。孑然一身，枯度晚年。但不管他的身体和生活状况好还是不好，精神正常还是不正常，他始终牵挂在我们心上。

2010年春节，当年兰考插队的朋友曾经有过一次聚会，谈及毛兵的时候，管宇春说毛兵精神病发作了，他妹妹监护着把他送进了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我问道，是大妹妹戚伟奋吗？管宇春说不是戚伟奋，是小妹妹戚伟雅。我大为愕然。毛兵有五个妹妹，大妹妹戚伟奋和毛兵的关系最好，对他也最崇拜。《一切为了九大》被批判以后，毛兵去北京清华住了一段时间，其间都是戚伟奋充当着

毛兵与我之间的联系人。毛兵一旦有了什么信息，她就会与我联系。1968年春上海市革会对中申会和《一切》的办班批判，由于“四·一二”的第二次炮打张春桥而草草收场。“四·一二”晚，市革会在上海音乐学院礼堂召开了《一切》的批判会。徐景贤作了主旨讲话。他说：“红卫兵小将们，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当时，我和红欧、王毅捷坐在台前接受批判。听了徐景贤的开场白，我的心陡然一惊：“四·一二”嘛，谁人不知，是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日子，怎么就把我们的《一切》上纲上线到如此地步呢？看来问题严重了。可是，徐景贤却又话题一转：“就在今天，4月12日，上海又掀起了一股炮打我们敬爱的春桥同志的反革命逆流……”闻听此言，我顿时放下了心：原来如此，此人阵脚已乱，对《一切》的批判必然不了了之，我可能就能被释放回家了。果不其然，当晚学习班就结束了，而第二天我也就被交大附中结束隔离审查了。但正因为对《一切》的批判是由于第二次炮打而草草收场，我预感到事情远没有结束，只要张春桥徐景贤还在台上，秋后算账那是早晚的事。

“四·一二”炮打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但在当时的大、中学生红卫兵中对于张春桥的怀疑却越来越厉害。有一种传言，说是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曾表态“可以自己的脑袋担保张春桥是叛徒”。此传言很快就为怀疑一切的红卫兵所采信。毛兵临行前曾神神道道地告诉我已经拿到了霍士廉的书证，此行北京就是要设法送达天听，清除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最后一颗定时炸弹。我听了以后很兴奋，因为能够以实际行动来清君侧、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是我们自投身文化大革命以来所始终坚持的革命理念。

过了不多久，戚伟奋约我见面，她告诉我毛兵终于将张春桥叛变的材料通过江青的姐姐送给了中央。听闻此言，我当然很高兴，叛徒终将获罪、终将被清除。过了不久，各大报刊登了毛主席接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的消息，毛兵又从北京传来了毛主席扬言要和林彪“重上井冈山”的令人费解的宣言，并通过戚伟奋要我在全市的主要街道刷大标语，呼应首都红卫兵的行动。我听了以后有点啼笑皆非。经过批判《一切》和“四·一二”炮打的被镇压，上海的红卫兵运动早已偃旗息鼓，我单枪匹马如何去落实他的“指示”呢？戚伟奋见我面有难色，非常着急，对我自然也很失望。

因为有了上述的接触，我知道戚伟奋对毛兵的感情之深，怎么毛兵发病了，

她就袖手旁观了呢？我疑疑惑惑地询问管宇春。管君一脸惊怖地说：“戚伟奋大概没了。”我不知道这“没了”是啥意思，惊问道：“怎么没了？死了？”管君说：“那倒不是。就是找不到她了。”我思忖了片刻，“那是不是也发病了？”管君点了点头：“有可能。”

哦，我们的毛兵！

我哑然默然错愕不已。事后，管君和李伟君、王鸿生去探望了毛兵。据说毛兵很兴奋，也都叫得出久违的老朋友的名字。

2011年2月5日的聚会，可以说是劫后人数最全的一次泛中串会聚会。但毛兵却依然一如既往地无法出席，给我以“遍插茱萸少一人”的深深遗憾。为了弥补这一遗憾，我、管君、张水荣、李逊相约探望。到了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门诊查了他的名字，说是没有这个病人。我们四人顿时相顾失色，顿生疑窦。管君和戚伟雅电话联系后才知道由于毛兵的病情比较严重，只好转院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以寻求更好的治疗。这一折腾，原本沉重的心情越发压抑了起来。除了管君，我们谁也没有探望精神病患者的经历，不知道那里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在我眼前出现的始终是好莱坞大片《飞越疯人院》的尼克尔逊，感觉很不好；但也有点好奇、有点新鲜。

我们去的时候正是患者自由活动的时间。工作人员得知我们是探望戚伟堂的时候，便好心朝着自由活动着的患者大声呼喊：“戚伟堂在吗？有人探望！”于是。远远地传来了一声：“来了！”

哦，这就是他那熟悉的声音，没啥大的变化，甚至也不苍老。整整四十年了，从他1971年春节刚刚过后的2月初的某一天被捕至今已经整整四十年了。那天他和蒋濮约好见面的，可他却被迫爽约了。蒋濮等了很久很久，满怀着失望、疑惑和某种不详的预感回到远在复旦九号楼家中的时候，她也被带走了，隔离审查了很久很久。那年的“一打三反”几乎把异端思想者一网打尽。春节前后，复旦的“反复辟学会”和胡守钧“小集团”主要成员相继被隔离，2月底红鸥和海鹰也从兰考被押回了复旦，5月，我、管宇春和张水荣也被相继隔离。1968年春，市革会曾组织了对中串会和《一切为了九大》的办班批判。我和红鸥被抓回了上海，而毛兵却与管宇春避居浙江四明山而得以逃脱。也许是当年的脱逃，也许是因为将张春桥的叛变材料递送给了江青的姐姐，毛兵的举动深深地激怒了当局，

于是此次便升级为逮捕。当时尽管明知在劫难逃，但是对当局动用公安机关抓捕一个中学生，依然是始料未及的。巨大的政治压力、以及无处逃遁的恐惧和委屈，笼罩在我们的心头……

我们被引进了一间会客室，但门是不能关上的，这是规定，也许是为了安全。毛兵依然是那样的不修边幅，随意穿在身上的上衣有着几条明显的折痕。好在他的精神还算矍铄，还能叫得出我们的名字。对于李逊，他是初次见面。但不知是出于对异性的兴趣还是竭力在脑海中搜索是否见过的印象，他居然狠狠地盯了她两眼。我们小心翼翼地发问，生怕刺激了他：“除了我们几个，你还记得谁？”毛兵说：“当然记得，还有红鸥，蒋濮。”管宇春告诉他，蒋濮想见你，不知道你想不想见。本来此次探望毛兵，主要是因为蒋濮想见他，让我们陪她前往。当时我还对她说，要是毛兵乍一见到你受到刺激怎么办？是否介意我把你们见面的情况如实地写出来？也许是我的几句话使她产生了疑虑，到时候她又变卦不来了。毛兵想了想，非常大度地说：“见不见的，也无所谓了。”我不由得想到，淡淡的一句话，蕴藏了多少情事。既然最怕他受刺激的话题都已经说了，以后的谈话也就容易些了。我们谈得最多的不是他身陷囹圄 3 年半的生活，尽管牢狱生涯在他的手腕上留下了永远不会消褪的深深印痕，而是他出狱后进行的哲学思考。

谈到他的哲学思考，毛兵完全恢复了当年的侃侃而谈。他依然微微地翘着他那独特的兰花指。2006 年是他集中发表论文之年：在《中国大学生》发表了《哥德巴赫猜想证明》，在《最优化报》发表了《四色定理原理》，在台湾的《中国文化月刊》连续发表了《宇宙论》五篇，但此次骤然发病也是在 2006 年。据他说发病前他还写了篇《时间几何》以阐述数学本质的论文，但未及投稿便被送进了浦东精神卫生中心直至今日。谈及此稿的不知所终，毛兵不免黯然神伤。不知是病情所致还是劳累的缘故，最初的兴奋已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则是迷惘和茫然，有点像陷入了悠远的沉思。随后他漠然地听从着我们的指挥，拍下了迄今为止唯一的合影。

告别了毛兵自然是心情沉重、唏嘘不已。但仔细想来似乎也不必如此。毛兵的精神分裂并非从他身陷囹圄开始，其实当初我们早就有所感知。在编辑出版影印版《红卫战报》的时候，毛兵共撰写了三篇文章。其中《论思潮斗争》和《从十月革命到一月革命》可谓是思辨清晰，引经据典随手拈来，洋洋洒洒，不须修

改一字就已敷衍成文；但是《一切为了九大》就不同了。初稿写就，读来使人茫然不知所措，思维非常乱。毛兵素以能言善辩取胜，但有时也会出现完全违反逻辑的狡辩。在讨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这些形而下著作的时候，他无疑是雄辩的、逻辑严密的；但在谈论费尔巴哈、康德和黑格尔的时候，他常常会对我们显现出不屑一顾的蔑视。早在八十年代初，我与一位曾经在长宁区精神病院工作过的作家探讨过精神病发生学的问题。据他说精神病患者的发病往往是因为遗传基因的原因，外部环境当然是触发其发病的重要契机，有时候身边的热水瓶突然碎裂，其爆炸声也足以使其发病。按说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数非常之多，但精神病发病率却没有因此而大幅度上扬。毛兵的精神混乱早就可见端倪，但与世隔绝的牢狱生涯无疑给了他沉重的一击，以至于精神分裂。

毛兵对于生活的要求不高，唯求温饱而已。早在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春，当我们沉浸在理论学习探讨的时候，几乎天天生活在一起，热忱地交换研读着能够寻觅到的书籍，几乎毫不顾及生活质量。到了吃饭时间，就到饮食店里去吃一碗阳春面，或者豆浆油条。连生煎和锅贴这种有肉的点心也很少吃，因为有肉的贵、无法果腹。那时候我们采取的是“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谁有钱就谁付账。三个月下来，我的脸都瘦了、绿了。实在饿得不行了，身边连小钱也没有了，我就想回家蹭饭。可毛兵不干，他非要拖着我们忍受着饥饿的煎熬继续探讨。为此我们时常会发生龃龉而不欢而散。毛兵似乎喜欢用苦行僧自虐的方式来锤炼自己的革命意志。他最推崇的是布朗基。布朗基几乎坐了一辈子的牢，但他的革命意志却始终没有任何衰减。我虽然敬佩他的毅力，但并不赞赏他。因为布朗基的一生少有作为。他的牢狱生涯无法使他的人民受到刺激和鼓舞，不像老甘地稍稍在狱中绝食几天就能使恒河流域风起云涌。

有时候我真想问问毛兵，这三年半的牢狱生活他是怎么过来的？但我曾经有过的隔离生涯告诉我，与世隔绝没有人说话、没有任何书籍、没有报纸、没有前途的生活是足以摧毁人的意志的。记得在延安中学隔离审查的时候，我曾经趁看守疏忽不备偷到一本《古文观止》的时候，是怎样地欣喜若狂；悄悄地轻声朗读唐宋八大家散文、以锻炼自己话语能力的时候，是怎样地带着恶作剧的欢快。还记得茨威格的短篇小说《象棋的故事》吗？每一个被关押隔离的思想者都会像小

说的主人公一样去寻找消磨时光的方式。我想，于毛兵而言，他一定是沉浸在他的形而上哲学思考中。时而清醒、时而迷惘、时而精神分裂。这种精神上的悠游和徜徉，于他而言，并非仅仅是为了消磨时光，而是一种常态的生存方式。对于思想者来说，伟大、出类拔萃和精神分裂有时候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后来我知道了，毛兵在研究“四色定理”和“哥德巴赫猜想”，我试图去理解他，也和他认真地探讨过，但我实在无法理解他从哲学层面的数学思考。我无法对他的理论思考作出正确的判断，也无法评价它的价值，甚至根本无法将其归入哲学的哪个领域。然而，人类科学思想史上常常有当代人无法理解、甚至极力诋毁、否定，但最终却被后世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理论。

我不知道毛兵的哲学思考是否具有这样先知先觉的价值，或许它全无价值只是痴人说梦，但我知道毛兵一辈子都在锲而不舍地进行着这样的思考，即便是在精神卫生中心治疗的时候。他从不追求现世生活物质层面的享受，只要能够思考他就会快乐。从常人的眼光看来，他形影相吊的晚年生活当然是悲惨的，他的精神分裂还必须依靠药物和其他医疗手段的治疗，但我要说的是，他依然在思考。毛兵精神分裂了，但他绝没有沉沦。

【文摘】

让记忆抵抗

野 夫

—

昆德拉曾经在小说中感叹——在黄昏的余晖下，万物皆显温柔；即便是残酷的绞刑架，也将被怀旧的光芒所照亮。

此即谓，人类本质上是善于忘怀的动物。伤痛抑或仇恨，都容易被时光所风化；尤其当作恶者易妆登坛，化血污为油彩粉墨之后，曾经的呻吟抽泣竟可能变声为娱乐的淫浪。就像那些此刻正沉醉于某歌中的某些人，他们似乎也在怀旧，但他们已不再记得那些恐怖旋律下的人性践踏；在温饱的余年，支离破碎的青春

被重新缝补成一道轻薄肤浅的抒情诗——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荒诞。

我只是这一堕落时潮中的反动者而已——在狂飙盲进的岁月里逆向而行，固执纠结在洪荒之初的草莽上，乃因这个盛装的时代如此可疑，美轮美奂的华表下一切显得那么鬼祟。我企图返回其纪元的元点去打量这一切的来历，努力在琴箫和谐的假唱中窥探其本该知耻的原罪。曾经有学者谓中国文化是耻感文化，圣贤强调知耻近乎勇。然则当世的荣光，是连耻亦不被确认的；仿佛诸恶不曾，骨血狼藉之后一切都万劫不复了。

于是，我深信，汉字的起点是忍辱负仇者在暗夜的刻划——他们在坚硬的龟甲青简上用石刀铁笔记录深埋于心的余痛。那些卜辞爻言中暗藏了这个民族的历史和祷告，以至于信史成为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只有在这些痛史面前，恶霸被千古追诉而令来者警悟，善良无辜得以表彰，得以列队于苍天下昭雪沉冤。

二

每一个人的记忆都会有个起点。就像每一幅泼墨写意的巨画，只有作者才能分辨它的始笔一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冬夜，我总是倦依墙角，面对着钢条密布的窗户，独自追索着自己人生的起点。某市监舍赫然坐落在闹市之中，自由人间的灯火，还能在那些玻璃窗上闪耀出恍若隔世的温暖。

那时，家父刚刚去世，狱警带着我千里奔丧，他亲眼目睹了囚首蓬面的我，却面对着党旗覆盖下的父亲向几百吊客叩首答谢。面对众多官民，我哽咽致祭曰——这里躺着我的父亲，多年前，他怀抱理想投身革命，至死保持着他那一代党人的朴素理想和本色，两袖清风地走完了他的一生。这样一些凡人的基本正直和高尚，在越来越成为稀有品质的今天，我相信父亲可以俯仰无愧地坦然辞别这个世界了。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是——怎样去做一个有尊严的人，让我知道良知和荣誉高于一切功名利禄。

在那一刻，我再次意识到生命是如此短暂而死神又是这样权威，一个好人并不能因为他们的好而得以长寿。大地掩埋了所有的善恶是非，父亲平静地走到了道路的尽头。在岁月长河中，所有的悲哀和创伤都会被时间抹平。如果没有记忆和历史，一切都将显得虚无。

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家族历史。父亲留给我们的遗嘱中说，希望将骨灰洒向面前这朝夕与共的清江，希望流水能送他归去。我知道这条江将远远地经过他旧居的门前青山，然后流向长江大海。父亲的游魂将消散于这波涛不息的水面上，如果我不为他记录的话，他的毁家灭门之痛，将从此遁入时代的黑洞——在那个忘川里，一切都被漂淡了。

于是，我开始检讨历史，我必须从被遮蔽的往事中找到一代人的苦衷。

三

每一个十字架下都埋藏着一部长篇小说——雨果这一说法，仅仅针对的是文学。事实上，文学在历史面前其实是苍白的。文学因其虚构的特征，似乎弱化了苦难的严肃性和沉重。在我们的土地上，历史，从其诞生之初，肩负的就是文史哲乃至宗教的使命。

一个人的生与死，并非华丽的文学所能概括，其生存背景才是历史的领土。每个人都将最终消逝，无论早夭或者寿终。但是留下墓碑的永远只是少数，而一望无涯的孤坟却如遍地荆棘般刺疼我们的眼睛。更可悲的则是填沟转壑的无名之死，连骨殖都未曾开出花来。

命运予我寒薄，而立未几已双亲尽逝，使我得以在泪干眼枯之后，平静地检索他们隐忍平生的坎壈。我将父系和母系家族的跌宕，置于二十世纪之大背景下考察时，我惊悚地发现，一切都像在劫难逃般的宿命——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卷入战争政争与党争——这也几乎是中国多数世家的相似命途；家族往事之戏剧化，并不更悲于整个华族的酸辛。

整整几代人的追求、背叛、搏杀与幻灭，都在现世的升平花腔中湮没无闻了。如果没有民间私史的刊刻流布，则无数歌泣生动的先人，仿佛从未经过斯世。而那些割头戮颈惨绝悲烈的疼痛，很容易就被正史掩盖而为来世淡忘。

窃以为，不长记性的民族是可耻的。当海量无辜的死亡连姓名都无存之时，美与善变得毫无意义，恶行也都被提前原谅。善恶即便难以在当世分享奖惩，原则上应该被历史鉴定荣耻。否则，恶无忌惮，辄善亦不被鼓励矣。那这样的民族，又何德何能进化于世界？

四

没有文字的民族是可怜的，如我的父系巴人土家族——其历史徒余传说。有文字而不许真实记录的民族，则是可恨的，盖因它在退化人类的品质。没有文字的语言，绝对无法永久流传。不能真实纪事的文字，则丧失其造字之初令鬼神夜哭的尊严属性。语言文字是思想的物质外壳，当这种外壳被歪曲甚或阉割时，思想则必然萎缩，族性亦将愈加猥琐。

三千年以来，华夏各族之烈烈志士，皆求以文字固化记忆，此乃为天地存心也。司马迁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而这一切，其根本意义原在“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长歌当哭，温故知新，纪史的内在动机是要抵抗遗忘和歪曲。任何一个民族的记忆，都不仅仅是由官修正史所构成——在那里，太多的秘辛被曲意掩藏和改写。我在我的阅读里发现，更为滑稽的是祖国的古史，都似乎要比当代史清晰，有无数前人的野史笔记在那里佐证。然而今天，一个家族的亲历都往往变得扑朔迷离，更不要说一个国家的编年大事纪，其中竟然充斥了无数虚构与抹杀。

于是，我想藉由对过往亲友的命运检索，来揭示上个世纪平民生活史的一斑。任何政治史都只是虚张的宏大叙事，只有在这些具体姓名背后的遭际，才可能更多地窥见我们曾经走过的岁月本相。

事实上，这样刻骨铭心的家史，不独吾家特具。我经常在酒肆邂逅的野老遗民口中，知悉更多析骨裂肉的惨痛。大地深雪，埋葬了太多无辜。竹帛难罄的遗事，荒芜在黄土垄上。这样的复述，于我并非艰难，只须秉承天良，便足以还原那些破碎的陶片。

五

历史之于民族国家的意义，实际等同于一姓子孙对家谱族书的珍重——其本质乃在对父系血缘的崇仰。崇父意识是民族的集体潜意识，厘清来历的暗怀渴望驱策我们要探索、书写和研读甲卜金籀，以穷通生命的源流去向。

作为党人一员的家父，平生兢兢，临渊履薄守口如瓶地走完了他的一生。在他身前，我竟然基本不知其来历。他很好地与他所在的组织一起合谋，扼杀了自己的记忆；以至于我这个儿子，都无从问脉他深怀不露的苦痛。

也许是因为他寥寥的遗言——要我为祖父将那抛尸的天坑盖上一——我才开始去追索当年的灭门惨剧。他似乎还能想象，盖掉一个天坑是多么巨大的工程；但他未能想到的是，我开始揭开另一个历史天坑的秘密，这才是真正浩大且远未竣工的作业。拙著《地主之殇》便是我对父系历史的勘察，在那里我发现了当年几百万生灵莫名涂炭的枯骨。

偏远乡村一个农夫之家的悲欢，在亚细亚从来对应着京畿某个独夫的喜怒。个体的生活史自古便是国家叙事不可或缺的构件，虽谓以蠡测海，却也足见其沧桑咸腥。无论史学意义，抑或社会学价值，皆不输于那些假言涂鸦的鸿篇巨制。

六

人生之短相对历史之长，无法不令人顿生虚无。在漫长的史前和史后，个体的生死际遇实在显得微不足道。然而人类何以要如此在意历史呢？

如果世界真是无神的，生命则是一趟有去无回的单程旅行。人类潜意识里畏惧的并非身体的死亡，而是对恍惚没有来过此世充满了隐忧。于是，我们有了史官文化以及对历史的拜祭——因为历史的存在，才可能让过往的生灵，复活在人类的共同记忆里。

就像我祖父的横死，曾经的暴尸也不足以令苍天开眼，是我的私人叙述才让他的死找到了意义——他被用来证明恶世的传说并非虚拟，用于警醒来者不要让恶重复。也因此，他卑微的生命才在帝王将相的起居注之外，走进了真正的永恒。

我的写作本质上传承的正是中国民间修史的伟大传统，是历朝历代那些冒着株连九族的风险，在梟首流放的长路上排队仍不肯掷笔的先烈们，遗传了我们以史证伪的渴望和冲动。想想当年那些夜雨孤灯下的荒江野老，斧钺相加而无畏，笔削春秋而令乱臣贼子惧，这才是这个民族真正可歌可泣的品质。尽管这一品质也在寒酷的现代，在血液里稀释；但是它依旧还能在苍凉乱云的天空，耀如星灯般召唤代复一代的苦吟血书者。

原载《看历史》杂志。

【文摘】

我在文革初期的红卫兵经历

杨小村

按：上世纪六十年代，广州的华南师范学院附中“两高”（高干、高知）子弟云集，相当于北京的 101 中学。文革初，该校贴出了广州的第一张大字报。本文作者杨小村当年是该校高三学生，其父杨应彬，时为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文革后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华师附中贴出了广东第一张文革大字报

1966 年 5 月 27 日，也就是在我入党后 3 个月零 24 天。这天下午 3 时许，在学校饭堂旁的板报栏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学校的教育”，写大字报的是高三（2）班的李重明同学。大字报的内容也很简单明了，就是对学校制订的一些制度，比如规定在假期必须参加劳动，没有劳动就不能注册等有意见，说王屏山校长不深入实际等等。

李重明的父亲李立，曾是安源煤矿工人，1927 年参加秋收起义，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他原是中南局组织部部长，1965 年调任贵州省委任书记处书记、省长。李重明放假回贵州没能及时赶回学校参加义务劳动，在高三上学期注册时曾被刁难过，因此他给学校领导贴张大字报，以此出口怨气而已。如果单单是这个样子，这张大字报就不会成为广州地区文革中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直至 5 天后的 6 月 1 日晚，被毛泽东誉为中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北大聂元梓的那张大字报才公开发表。

事实是在酝酿写这张大字报前，李重明和高三（1）和高三（2）班的几位军干子弟如：蔡晓彦（广东省公安总队第二政委蔡炳臣之子。蔡炳臣后调湖北省公

安总队任政委，1965年取消公安军后，该部改称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即8201部队。蔡在1967年的武汉七二〇事件中被打倒）、苏立功（广州军区二局政委之子）、桂林琪（南海舰队政委桂绍彬之女）、刘敏荔（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刘兴隆之女）等同学有过商议，他们在此前就已经在家中偷看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当前教育制度，提出不要把学生培养成“五分加绵羊”式的修正主义苗子等内部文件，相约去见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未果；于是翻越军区大院围墙直闯陶书记家，在得到陶铸亲口支持的承诺后，有步骤地放出一个试探性的信息来。

大字报贴出后，我被几位同学簇拥着前去观看。站在一旁的高二（4）班贫民出身的同学李八莫边看边骂，从激动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对这张大字报的愤慨。于是我作为刚刚才加入党组织的一名新兵，站在维护党的威信立场，对身旁的李八莫说：“你不同意他的观点，也可以写张大字报批驳他嘛！”于是一个小时后，在第一张大字报旁，出现了第二张大字报，内容是指责李重明“眼里没有学校领导”、“别有用心”。

“一石激起千重浪”！这两张一正一反的大字报，像一颗炸弹把平静的校园炸得沸沸扬扬。当晚，学校掀起了大辩论，许多人彻夜未眠。有的同学还半夜到省委，请求派出工作队来领导运动。

第二天，全校自动停课，同学们在各自的班上，以这两张大字报为题，展开了空前的大辩论。辩论的主题主要有：这张大字报是否转移了当前对“三家村”的批判，是否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这样做是不是否认党的领导，华师附中是否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等。在大辩论的同时，大字报也在校园内满天飞。

面对混乱的局面，学校党总支于5月29日贴出了“校党支委给同学们的一封信”，表示“热烈诚恳地欢迎你们向学校提意见”。对前一段提出的意见给予肯定，表示“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校领导的这种表态，很快就被蔡晓彦等同学指责为是抹杀了学校敌我矛盾存在的可能性，认为校党总支的这张大字报“成为我校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黑线的挡箭牌”！这样，两派辩论的内容就从应不应当向学校提意见陡然上升为学校有无资产阶级黑线的敌我矛盾上来了。于是乎，一边是指责蔡同学等要“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一边是贴出“挽弓当挽强、用剑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大字报，表示要

与阶级敌人决战到底的决心。

1966年6月3日（或4日），省委主管文教战线的区梦觉书记向附中派出了第一支工作队（这是全国最早派出的工作队和工作组），旨在将学校方兴未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纳入正轨。工作队队长陈鉴泉（时任省文教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副队长周宽（时任省委接待处长），一个是领过兵打过仗的师级干部，一个当过四会县的县委书记。他们进校之初，对领导附中的运动充满了信心。用周宽的话来说，“我领导过40万人的四会县，我就不相信领导不了千把人的附中！”

可是他们并不知道，拨弄文革这面大旗的旗手是毛泽东，是他“运动”了全党，“运动”了全国。工作队一进附中没几天，就开始与部分学生产生了矛盾。6月下旬开始，以蔡晓彦等十一人为首的部分学生就提出了“撤销工作队，自己闹革命”等口号。围绕着要不要工作队，学生们分成了两大派。

毛泽东于1966年7月18日突然从武汉回到北京，在听取了各地有关工作组（工作队）的汇报后，他于25日召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在毛泽东的指令下，北京市委于29日召开了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邓小平、周恩来先后讲话，都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在讲话中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太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会上，宣布撤销所有工作组。

由于有了北京的文革精神，华师附中反工作队之风也就陡然刮到了十二级，周宽曾被批斗得昏将过去，陈、周二及工作队最终灰溜溜地离开了学校。

其实早在7月19日，蔡晓彦、李重明等十一人已就工作队问题写信给在中央工作的陶铸，反对工作队镇压学生运动。陶铸秘书张汉青于1966年8月2日在给十一人的回信中说：“陶铸同志明确指出，你们学校的工作队的作法是极为错误的，并将你们的来信批转给吴芝圃、赵紫阳、区梦觉等同志，请他们亲自处理。”反对工作队的同学看到这封回信，兴奋地在学校中高喊：“陶伯伯给我们复信啦！”“陶伯伯支持我们啦！”由此，更加造成了两派学生的对立。

广东最早的两个红卫兵组织

8月11日，从北京传来了由清华大学附中几位同学撰写的三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全校学生受到莫大鼓舞。

2006年，香港德宝出版有限公司发行了宋柏林著的《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一书。看了这本《老红卫兵手记》，我才搞清楚，当时宋柏林参与了骆小海主笔的这三篇闻名于世的大字报，原标题是“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再论与三论也都一样。后来中央文革把它们刊载于同年8月2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一期时，标题分别改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与此同时，“红卫兵”的称号也第一次传到华师附中。与红卫兵同时南下到达广州地区的还有著名的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中间儿骑墙——基本如此”。宋柏林（原名宋汉东）原为华师附中学生，与我同级。1965年因其父调动工作，他也随之转学到清华附中。宋柏林是红卫兵的创始人之一，他有记日记的习惯，并坚持了四十多年，又因他的家庭在部队，没被抄过家，这些日记有幸被保存下来。这部《红卫兵兴衰录》可谓是研究红卫兵运动史的第一手材料，编注这本书的则是低我三届的华师附中同学余汝信。

在赞成还是反对血统论，保学校领导还是反学校领导，保工作队还是反工作队的基础上，再次把附中1600多名同学重新划分为两大派。那天晚上，同学们以球场舞台为擂台，两派针锋相对地展开舌战，欢呼声和叫骂声此起彼伏，这场辩论不分高下，但两个派别因观念的差异已经形成。

轮到高一级女生李利民（李尔重之女）上台发言，她支持血统论，激动地大声呼喊：“我们天生就是革命的！因为血管里流着的是革命父辈们沸腾的热血，身上有革命先辈们的钢筋铁骨，因此我们就是从里到外都红透了，红得发紫了！天塌下来我们都擎得住！”她的发言博得“血统论”支持者的热烈掌声。她同班的一位男生在台下大声道：“什么天塌下来擎得住！一担粪桶就把你压扁了！”反对血统论的这派学生于是哄堂大笑。李利民个子矮小，身体娇弱，下乡劳动时帮“三同户”挑大粪施肥，一担粪桶都挑不起来。她后来一生相当坎坷，这是后话。

我虽然出身革命家庭，但对血统论很反感。过去一直强调出身不由自己选择，但走什么样的道路，却可以选择。就是拿我们所熟悉的领袖们来说，像毛泽东、周恩来这些革命家的出身都不好，怎么能把出身作为衡量一个人革命还是不革命的分水岭呢？

经过这场大辩论，以蔡晓彦、李重明等 11 人为首支持血统论的学生紧锣密鼓地筹划成立红卫兵组织了。并于 1966 年 8 月 11 日，贴出了《附中红卫兵宣言》，宣称成立附中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后来改称为华师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这是广州地区的第一支红卫兵组织。同一天，同学们推举我，为自己的红卫兵组织命名。我说“毛主席住在中南海，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就叫中南海红卫兵。同时，我们位于祖国的南海，我们红卫兵就叫华师附中南海红卫兵吧！”同学们一致赞成，于是第二个红卫兵组织——南海红卫兵也紧跟着成立了。

主义兵比较激进，行为也比较过火，差不多的校领导和老师都在他们打倒之列。南海红卫兵主张讲政策，在批判旧教育制度的同时强调实事求是，对学校领导和老师们大都采取保护方式，不主张使用武力体罚老师。当时像王屏山校长、麦嘉祥教导主任虽然都被批斗了，南海红卫兵却专门派出同学守护在他们家里，防止对立派乱来。但麦嘉祥老师最终受不了打击和折磨，自杀身亡，成为华师附中文革浩劫中的第一位牺牲者。

南海红卫兵进驻华侨新村惊动了周总理

8 月 1 日至 12 日，毛泽东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简称《十六条》），他还在 8 月 5 日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8 日，毛泽东又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并提出了“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号召。随之而起的是汹涌澎湃的红卫兵运动。

既然是文化大革命，就要革掉那些属于封资修的文化，这样子就把红卫兵的注意力都吸引到社会上去了。于是长头发、漂亮的衣服，除了毛选之外的所有中外书籍，甚至文物，都成为红卫兵破除的对象。

那时许多女同学都主动将长发剪短，甚至干脆剪成男性短发。红卫兵在大街上可以随时随地剪女孩子的辫子。有的女生剪了头发，再加上穿了件旧军装，使人分不清是男是女。红卫兵也随意到人家家里去抄那些所谓“封资修”的东西。这时，华师附中也被同学们更名为广东省东方红学校。同学中一些带有封资修味

道的名字，也被勒令或自觉地改掉。像苏忆美改为苏战英，黄国庆（十月十日出生）改为黄逆庭。一位叫贾圆圆的女生被人批判说像妓女陈圆圆的名字，不革命！于是她索性改名为“革命”。但和她的姓连起来，便成了“贾（假）革命”。还是被批斗了，真是荒唐至极，令人啼笑皆非。那时“忠东（忠于毛泽东）”、“东彪（毛泽东和林彪）”、“学青（学习江青）”、“红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卫红（保卫红色江山）”“学军（学习解放军）”等名字真是铺天盖地，有的还一直沿用至今。

为了扩大“破四旧”的战果和影响，我组织南海红卫兵到烈士陵园、南方大厦、黄花岗等地进行宣传。我们事先找了一些人到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请他们教我们扭秧歌、打腰鼓，及排练一些基本的舞蹈动作。我们则自编、自导了一批小节目，到街上演出。

那一天，我们南海红卫兵在黄花岗破四旧的行动还被当时广州地区的报纸作了报道，我们看到个个都沾沾自喜。

在大街上瞎折腾一阵子后，我想，广州市内封资修的东西最集中的地方，莫过于位于区庄附近的华侨新村了。那里住的都是归国华侨，封资修的东西肯定最多。于是我从南海红卫兵里拉了两三百人进驻华侨新村，把华侨新村围得个铁桶般牢固。

我们把这支队伍编为一个营，下设三个连，按部队建制，有组织有分工地集中破四旧。刘志修（陶铸外甥）、邢立安、吴华东和我分别担任营长、副营长、教导员、副教导员。

我们一进驻华侨新村，时任广州市侨办副主任的李伟阿姨（广东省军区陈德司令员的夫人）就赶过来了，她苦口婆心地给我们讲解党的华侨政策，并要求我们在破四旧中千万要把握分寸，不要伤害华侨及其眷属。李伟阿姨的提醒，使我们在华侨新村的两个多月的行动中受到约束，未给华侨造成更大的伤害。

那时我们逐家逐户检查封资修的东西，同时对抄出来的贵重物品，如现金、股票、黄金、首饰、手表、摩托车等都登记造册，然后派专人送到省政府大院集中保管。而且一再强调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任何人不得侵占。后来有一个红卫兵在抄家过程中偷拿了几张珍贵邮票，我们发现后立即把他开除出红卫兵队伍。

由于当时中央有令，要趁红卫兵破四旧的机会，将“阶级敌人”（出身不好，或是擅自从外地迁入广州又赖着不走的人）设法赶回农村去。于是每天晚上，当地派出所的民警就会向我们提供住在附近的一些人的名单和地址，并派上车拉着我们去抄家赶人。这种行动大部分是在深夜或下半夜进行。那时我才 19 岁，正是一个贪睡的年纪，但为了不耽误“革命”，我与营部几位领导商议，决定从抄没华侨的物品中借一块手表，以掌握时间，每人都写一张借条，用完后立即归还。

一天我回到家，父亲看见我手上怎么突然多了块手表，于是追问我，我把借表的原由向父亲说了。他严肃地说：“你们参加革命才几天，怎么能拿别人的东西？就算是工作需要，也是不允许的。你回去跟你那几位头儿说，就说是我讲的，统统退回去！真有需要回家想办法去！”同时，他拿出一块带了十多年的旧表递给我，说：“这块罗马旧表是我从香港到十万大山打游击时，华南分局的交通员吴德中送给我的，旧是旧了点，但还能走，你先拿去戴吧。”我感激地戴上父亲这块旧表，回到营地传达了父亲的话，同伴们听后都挺受教育，于是把手表都交回去了。

有一天，李伟阿姨找到我说：“周总理十分关心华侨新村的情况。他实在没空，委托秘书过问，现在电话接通了，你来汇报情况。”我接过电话，详细地汇报了在华侨新村破四旧的做法。秘书听得很认真，问得也很仔细。末了，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总理十分关心这件事，因为那里面住的华侨，有很多是和我们党长期合作过的有功之臣，他们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甚至在建国后，对国家和人民都做出了贡献。希望你们一定要掌握好政策，四旧要破，但人一定不能伤害，像邓文钊、黄洁等，一定要保护好。”

当时我们几位红卫兵领导就住在邓文钊家。邓文钊是广东五华人，他从抗战开始，就同何香凝、宋庆龄等一起，为抗日战争捐钱捐物，四处奔波。解放战争中，他遵照中国共产党指示，又在香港复办《华商报》，任《华商报》社长，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摇旗呐喊。解放后，他担任广东省副省长，省华侨投资公司的副董事长，确实是一位爱国爱民的老华侨。原先我们把他赶到三楼主，并对他的行动有所限制，在总理秘书来电后，我们让他搬回二楼住，同时也取消了对他行动的限制。

但是，另一位爱国华侨副省长黄洁就没有这样好的待遇了。

当时，为了防止外校的一些红卫兵进入华侨新村捣乱，我们组织了巡逻队，特别是在晚上加强巡逻，防止发生意外。

有一天凌晨，八一中学的几个红卫兵趁巡逻空隙钻进黄洁家拍门。黄洁儿子是广钢工人，平时不在家住，他老伴身体不好，黄洁只好亲自开门。门一打开，几个凶神恶煞的红卫兵手执皮鞭，铁链就要打下去，黄洁本身患有心脏病，被这么一惊吓，心脏病顿时发作，当场倒地，那几个红卫兵见状立即如鸟兽散。等巡逻队闻讯赶来，联系救护车送到医院时，已回天无力了。黄洁去世后，受周恩来指示，《南方日报》还登载了他逝世的消息，文中盛赞他爱国爱乡之壮举。

就在这时，由北京多家红卫兵组织发起砸毁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行动，以此彻底否定旧民主主义革命。当知道这一消息后，我们也曾组织华南师院附中的南海红卫兵参加保卫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行动。这一行动虽引起双方激烈的辩论，但未发生其他过火行为。可是过后不久，七十二烈士墓中的自由女神像还是被一些过激的红卫兵组织砸毁了。

我向省委申请到上京的专列

我是在华侨新村得知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消息的，紧接着，他又在8月31日和9月15日再次检阅了红卫兵，还在中南海大门外接见革命群众。最高统帅对红卫兵的一系列“壮举”，使我们的优越感倍增，同时也萌发了上京的强烈愿望。在毛泽东接见完第三批红卫兵之后，我终于按捺不住了。

于是，我和区梦觉的女儿区惠风跑到省委，找到负责接待红卫兵工作的省委候补书记张根生。我对他说：“张叔叔，现在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都能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见，我们也要去，您能否给我们批一列火车，我组织广州地区的红卫兵上京去！”张根生认得我们，也知道我在附中是位红卫兵的头儿，于是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批了一列专列，由我指挥。

回到华侨新村，我把这消息一传达，大伙儿高兴得直跳。于是，除了留下少部分红卫兵看守阵地外，大部分在华侨新村的红卫兵及在校的其他红卫兵都准备乘专列上京。我们严格地把队伍分成若干小队整齐地登上火车。在火车站上，也

吸收了部分外校红卫兵上车。就这样，我们于9月下旬浩浩荡荡上京去了。

上京的心情是激动的。我对北京的向往和认知，是从四年前（1962年）父亲写的一篇散文《上京》中得来的。散文一开始就深情地发问：“你去过北京吗？”“没有？那你渴望上京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你上过北京啦？那你上京时的心情又是什么样子的？”

父亲从长安街走进天安门，看见广场上，东西长安街上像怒放春花的繁灯，异常灿烂，火树银花，五彩缤纷。与天幕上的繁星连在一起，分不清天上的是灯光还是地上的是星光。他把这些灯光和星光与革命的星火联系起来。1919年5月4日，从天安门广场，长安大街迈开了中国人民革命大军的步伐。经过三十年的英勇奋斗，革命的队伍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不是在别的地方，恰恰又是在天安门广场。1949年，飘起了象征全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父亲在散文结束时，铿锵有力地说：“对！条条道路通北京。上北京的道路就是走向胜利的道路。”

今天我也要上京了。我要沿着父辈们走过的这条上京之路，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继续下去，夺取世界革命的最终胜利！

到北京后，我们学校的红卫兵被安排住在中国人民大学。女生们有床铺睡觉，男生们则在运动馆内打地铺，下面垫一些麦秆，上面加一张褥子，睡起来倒也挺软和。那些天我们吃的是小米粥加窝窝头，许多同学是南方人，吃不惯，我倒吃得很香。白天我们到清华、北大等学校去看大字报，并随时抄摘大字报上的内容，晚上在一块开会，交流心得体会。

一天下午，我从外面回到住地，有同学告诉我，说学校广播找了我几次。于是我赶到学校保卫部，询问是什么人找我。保卫部的同志很热情，让我坐下像查户口似的，详细问了我的身世和家庭情况，特别注重地问我父亲的情况。我如实回答后，他们说，明天下午你再来这里。第二天下午我准时到达后，看见除了保卫部的人员外，还多了两位解放军干部。在进一步核实本人身份后，军人告诉我，你被选上红卫兵代表，国庆那天将参加观礼。

1966年9月30日下午，我在人大门口坐上一辆由军人驾驶的华沙轿车，在两名解放军干部的陪同下驶去。不一会儿来到了先农坛体育馆。在球场中间已经聚集了约二三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会场里熙熙攘攘，嘈杂得很。

我报到后，就分队分组。由于当时通信不发达，要集合全国各个省市的红卫兵代表，确实不易。因此我们从下午一直等到傍晚都坐在体育馆球场的草地上。天色渐暗时，终于安排上车了，七八部大巴拉上我们，开出了先农坛。

由于我是第一次上京，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也不知道现在的位置，更不知道我将要去哪里？问车上领队的军人，他也不回答。汽车路过北海公园南门后突然向左拐进一座大门。“中南海！我们到中南海啦！”一位大概是北京的红卫兵在车厢里高喊起来。全车的红卫兵都欢呼起来，个个都把头往窗外伸，但在夜幕中什么也看不见。

车子在一栋办公大楼前停下来。红卫兵小将们蜂拥挤下车，军人们指挥着列好队向我们宣布：“这里是中南海，你们作为全国红卫兵的代表被毛主席邀请到这里作客。你们就住在这座大楼里，这是总理办公大楼。为了安排你们住得好，中南海的家属每家每户都拿出新的被褥给你们盖。这里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你们不要乱跑，要遵守纪律……”

军人的话还没说完，身后就簇拥着走来了一批人。我定眼一看，是江青！她头戴呢子军帽，身着呢子军装，披一件呢子大衣，风风火火地走到队列前面。站在她身旁的是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他也一身戎装打扮。他说：“红卫兵小将们，江青同志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来看望你们啦，下面请江青同志讲话。”掌声刚响起，江青就伸出双手反复做了一个往下压的动作，掌声随着她的指挥戛然而止。只听见江青扯开她那特有的高八调嗓门拉长了每一个字说：“红卫兵小将们，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来看望你们啦！你们都知道这里是中南海，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为了不影响毛主席的休息，我讲完话后，请你们不要鼓掌，不要高呼口号！你们很幸福，明天，你们就能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啦！（欢呼声欲起又止）。我向你们红卫兵小将们致敬，向你们红卫兵小将们学习！你们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说完话，江青转身就走了。

江青走后，我们开饭了。原来我们这批红卫兵代表是准备参加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的。只是代表集中的时间太长，错过了时间，于是把国宴上的饭菜都搬到中南海总理办公大楼门前的草地上。我们席地而坐，在草地上吃了一顿美味的国宴大餐！

晚饭后是自由活动时间。一大群红卫兵围着周荣鑫要他签名。我也挤进去，

请他在我的《毛主席语录》首页签了名。又见一群红卫兵围着一位和我年纪、个头都差不多的红卫兵在谈论什么。我挤进去一打听，原来他就是赫赫有名的江姐的儿子彭云。他比我大一岁，江姐牺牲时，他只有三岁。红卫兵听他讲述江姐的故事后都抢着要他签名，被他一一谢绝了。人群渐渐散去，我走到彭云跟前对他说：“我哥哥也是哈军工的，叫杨小斌。”他说：“我认识他。”于是很爽快地在我的日记本的首页上写下了江姐临终前写给他的那句名言：“望踏着父母之足迹，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并签上他的名字。

我回到宿舍立即写日记，急切地把有生以来的最大兴奋与激动记录下来。写完日记已快 10 点了，北方来的同学裹起棉被就呼呼大睡，南方人临睡前都要洗洗脚，擦擦身。于是我穿上拖鞋，拿了一个小脸盆和毛巾，出了宿舍门向走廊中间的洗漱室走去。

刚一出门，我就被身后的嘈杂声惊动了。我回头一看，只见大门被推开，前面是一队 8341 部队的战士，他们沿着走廊两侧迅速组织了一道人墙。一些记者手持照明灯和摄像机簇拥着一个很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眼前：是周总理！“周总理来啦！”我兴奋地欢呼起来，被欢呼声惊动的红卫兵都从床上爬起来往门外挤。但每间宿舍门口都被 8341 部队那些训练有素的战士们给把守住了。在整条长长的通道上，只有我一人。

我这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丢下脸盆和毛巾，三步两步跨冲到总理跟前。总理伸出他那只永远伸不直的右手，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一股热流顿时通遍全身。我边握住总理的手边喊：“总理好，总理好！”他亲切地问：“你从哪里来呀？”“我是广东来的！”“路上辛苦吗？”我说：“不辛苦。省里派了一部专列送我们来的。”“那样好！那样好！”

看着周恩来疲惫的身形，只有一双眼睛依然那样炯炯有神，他比我在四年前观看《五朵红云》歌剧见他时苍老多了。他在人民大会堂安排完国宴后有那么多事务，这么晚了还到红卫兵驻地，逐个房间来看望我们，多么好的总理啊！28 年前，他和博古代表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接见了特支成员，那时父亲比我现在年龄还小两岁。周恩来看见又矮又小的父亲，风趣地叫他“小同志”，摸着父亲的光头说“后生可畏”。会议结束后，总理握住我父亲的手时还说了句：“长江后浪推前浪！”现在，“后浪的后浪”也来了。我暗自发决心，一定要紧跟

毛主席，紧跟周总理，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惜！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周总理就匆匆地走了。

毛主席发现了我掉在地上的红卫兵小报

第二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七周年国庆日。中央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红卫兵游行，毛主席亲自检阅。

一早我们吃过早点就步行来到天安门城楼旁的中山公园。由于伟大领袖习惯夜间工作，早上起不了床。于是我们足足等了一个上午。中午时分，在用完午饭（每人一包点心）后，终于可以登上天安门城楼了。我们排着队从西面的石板阶梯鱼贯着拾级而上。

登上天安门城楼一看，哇！整个广场被无数的红旗、红花、红宝书（毛语录）装扮成为一个红色的海洋。广场南面，由十万名学生组成的一个大方阵，不时地变幻出最时髦的政治口号。广场东头已集合了雄壮的红卫兵游行队伍，排着整齐的方阵，准备迈入广场正中，接受伟大领袖的接见和检阅。“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像是要把天安门城楼震垮一样不停地响彻天际。

大约到了下午两三点钟，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红卫兵代表队伍中，不知是哪位高个子红卫兵高呼了一声：“毛主席来啦！”队伍立即像潮水般从西向东涌去。当兵的死死用身躯抵挡住，领队的大声喊：“大家不要挤！等会儿会安排你们从毛主席身前走过！”但红卫兵个个还是跳跃着，伸长了脖子争着去看伟大领袖。我一米六八的个头，在人群中是属于矮个子，啥也看不见。我急了，突然看见身旁有一根铁柱子，我也没想这么多，噌地一下子就爬上去了。我终于在一群中央领导中远远地看见了毛泽东的侧影，于是大呼“毛主席万岁！”这一喊可把在城楼上站岗的解放军战士吓坏了，由于他的岗哨是固定的，不能动，只能大声冲我说：“赶快下来！这是旗杆，不能爬！”经战士一声喊，我举头一看，才知道我爬的柱子竟然是天安门城楼上，东西两边各竖立的四桿红旗中的一杆！

大会很快开始了，林彪代表中央讲话，但他讲话的内容，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一句也听不见。他讲话后，红卫兵大游行就开始了。由于每一个方阵经过金水桥前面时总要多逗留，以便能瞻仰伟大领袖的龙颜，所以游行的速度被大大减

慢。时为中央第四把手的陶铸用麦克风指挥着这支大军，他扯开嗓子大声呼喊：“请红卫兵小将们赶快往西走，往西走！”在当时“东风压倒西风”的强劲政治形势下，陶铸一个劲地呼喊往西走，不知是不是一种预兆。在紧接下来的三个月后，他就被江青一伙戴上“中国最大保皇派”的帽子，彻底断送了政治生命，走向人生尽头最西面。

红卫兵代表走过领袖们的面前，接受最高统帅检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在此之前我们被一再告之，毛主席在前面三次接见红卫兵过程中，由于小将们太激动，把他那只厚实温暖的右手都握肿了。因此，这次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接见，希望大家不要和主席握手，不要送礼物，不要给主席戴袖章。

这时，毛泽东与以他为首的中央领导人都站到了台阶上，而我们则从台阶和城楼栏杆之间的走道上缓缓通过。我一边走，一边挥动着红宝书，一边观看台阶上的领袖们。从右面数过去，分别是郭沫若、陈毅、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邓小平、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毛泽东、林彪、陶铸、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刘少奇的位置已经从第二把手下降了许多位，整个人萎靡不振、脸色灰青、面无表情地站立着。

我这时的全部热情和目光都停留在朝思暮想的“红太阳”身上。只见毛主席身着草绿色军装，衣领上和所有士兵一样，只有两块小红布。自从1965年取消军衔制后，全军从刚入伍的士兵到最高统帅，都一律只有这两块红布，如不自报职务，双方都不知道谁该向谁敬礼，谁该服从谁的指挥。

这时的毛泽东比五十年代要发胖很多。他昂着头、神采奕奕、目空一切地瞥了一眼站到右边隔了好几位的少奇“同志”……

毛主席看见我跳跃着正从他面前走过，右手拿起军帽向上扬了两下，把我煽忽得全身热血沸腾……

从天安门城楼下来后，我们被安排在两侧的观礼台上，继续观看杂乱无章的大游行。我对广雅中学的赵宏渊说：“咱们还是倒回天安门城楼下，看能否再多瞧瞧毛主席？”于是我俩溜出来窜到城楼下。这时游行队伍已经基本结束。天安门广场前负责摆字以及周围摆花的、扛旗的十万名红卫兵像潮水般涌向金水桥。他们整齐地、有节奏地高呼：“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那撼天动地的声响几乎可以让金水桥下的河水倒流。

当我俩走到西面城楼下时，毛主席已经离开了。我预计他会到东面城楼上，扶着栏杆拿着军帽再次向下面的红卫兵挥手的，于是赶紧向城楼东面走去。正当我走到城楼正中的那座门洞时，我愣住了。只见伟大统帅在几位军人的搀扶下，竟然从门洞那头向我缓慢走来了。

这真是天赐良机、千载难逢！我一边高呼着“万岁”，一边向门洞内跑去，眼看还有两步就能和伟大领袖握上手了。说时迟，那时快，突然从毛泽东身后冲出一支高大的卫队来，把我们这些红卫兵小将冲得人仰马翻，四散而去。然后硬从城门到金水桥头筑成两道铁桶般的人墙来，让伟大统帅步履蹒跚地走向金水桥那端的沸腾人群中去。我这时被冲得晕头转向，等我清醒过来后，才发觉自己身处金水桥最高处，居然还是站在解放军战士手臂挽着手臂拉起来的保护圈之内！站在身后的战士嘴里嘟嘟囔囔地说：“你赶快到我身后去！”但我知道他的手臂不能松脱，否则这座人墙立即会崩溃。我和他协商好，我站在原地不动，他也不赶我。这时，毛泽东正缓步向金水桥走来，只见周总理领着江青在卫队的簇拥下从城门跑来。周恩来一边跑一边喊：“主席，您慢点走！”

原来当游行结束后，周恩来正忙于布置晚上的庆祝活动。毛泽东突然心血来潮，在未通知中央警卫局，也未和总理打招呼的情况下，就让身边工作人员领着了城楼，直奔向金水桥。等周总理回过头来一看，毛泽东不见了！一问，才知道他又耍脾气，单独去闯十几万红卫兵小将的“龙潭”去了。总理立即指示 8341 部队用最快速度筑起人墙，保护好伟大领袖。然后拽上江青从后赶来，并在上桥时追上了毛泽东。我看见周总理喘着大气虔诚地上前去搀扶毛泽东，却被毛的大手甩开，然后大步向金水桥的南端走去。快走到我跟前时，毛泽东突然转过头来，用手指着地下散落的几片纸，对身后的总理说了一句话。由于欢呼声波太大，我没能听清伟大统帅发出的号令，只见总理立即俯下身去，亲自去捡拾，然后把踩皱的那几张纸片抹平，折好，小心翼翼地装进口袋。看着这一幕精彩的主仆剧，我突然想起，周总理装进口袋的那几张纸片，正是赵宏渊送给我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小报，在观礼台上没来得及看，刚才被卫队冲撞时散落了，没料到在最高统帅的指示下居然装进了总理的口袋。

毛泽东向金水桥的南端走去了。我站在桥中最高处，只能看见他们的背影。人群沸腾了，狂热的呼叫伴随着热泪洒满了金水桥头。红卫兵娃娃伸出幼稚的双

手，从金水桥上望过去，比千手观音的手还多。为了保卫伟大领袖，前面几排战士拼命用身躯抵挡，但面对汹涌的人群，他们也只能步步后退。我看见总理也伸出左边的胳膊，用力抵挡着。毛泽东一看势头不对，如果再坚持哪怕多一分钟，也可能会发生危险。于是在总理和江青的再三劝告下，毛泽东才决定撤退，坐上从门洞里开出来的几辆吉姆大轿车回中南海去了。

广场平静了，红卫兵娃娃们有些带着幸福，更多的是带着遗憾渐渐散去了。

当天晚上，伟大领袖重施故伎，不在城楼上观看国庆烟火，而执意要到金水桥下与广场上千千万万个红卫兵娃娃们席地而坐，一同观看盛大烟花表演。当然，晚上这次行动由于事先有准备，中央警卫局作了严密保卫措施，与红卫兵同乐的活动显得井然有序。

看完烟花后，我们回到中南海总理办公大楼又睡了一晚。第二天下午，总理在中南海北门对面的中央军委礼堂为我们作了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他竭尽全力地去理解和诠释伟大统帅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企图跟上毛泽东的步伐。报告内容由于当时的笔记本已经丢失，遗憾不能在此转述。

报告会结束后，总理领着除毛泽东、林彪等人之外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和红卫兵代表们在军委礼堂对面的广场上合影留念。这圈长幅照片我依然保存着，虽然逝去的岁月已经久远，加上南方潮气很重，相片也早已斑驳陆离，但仍能分辨出周恩来、叶剑英、陶铸、陈毅、康生、李富春、江青等十多位中央领导人以及穿着军装的我。

结束在中南海的三天生活后，我返回中国人民大学住地，红卫兵战友们饶有兴趣地听我详述入住中南海后的见闻。特别是听说我受到江青、总理和毛主席的接见，还和总理握了手，差点就和毛主席握了手的精彩经历后，大家都激动地一个个轮流和我紧紧握手。似乎握住我的手，就像是握住了周恩来、毛泽东的手一样。

留守华侨新村的红卫兵打死人了

10月上旬我回到广州，这才知道在我上京期间，留守在华侨新村的战友们打死了一个“地主婆”。

我们当时坚持不搞体罚、不打人、也不做羞辱华侨人身的事。红线女在那里也有一座别墅，但当时她没住那，而是住在东山培正路的另一栋别墅里。红线女被在那里抄家的红卫兵欺凌羞辱，剃了一个阴阳头。我上京后，一个被管制的“地主婆”不老实，被留守的初中红卫兵集体群殴致死。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一些红卫兵已被革命的激情锻造出缺乏人性的情感，一些人将无情当作革命的坚定性，将野蛮当成革命者的勇敢。在一些学校，有个别红卫兵已被扼杀了人性，回归到乱施暴行的兽性，他们肆意打死校长和教师。而这些人满怀“砸烂旧世界”的豪情，甚至认为打死一个“地主婆”还是一种“革命”的行动。文革后曾有专案组调查此事，但知道我当时有不在现场，也就没来找我询问。

抡起皮带保省委

在毛泽东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高潮过后，红卫兵简直把自己看作是革命的救世主，越敢造反越革命。那时最响亮的一句话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只是这个皇帝不姓毛，而姓刘而已。

在这一年的盛夏之际，在中央文革授意下，以北京中学红卫兵为首的大串连爆发了。他们乘着免费的火车，南征北战到处煽风点火、揭盖子。当时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一〇一中、北师大女附中等学校是干部子弟最集中的学校，其中尤以北京一〇一中学的红卫兵最为凶狠。

10月中下旬，以北京一〇一中学红卫兵为首的一批外地红卫兵窜到位于东湖公园旁的省委大院。省委候补书记张根生以红卫兵接待办负责人的身份与这批红卫兵多次交涉，但都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几次冲击省委办公大楼，还要亲自审讯赵紫阳等省委领导人。不知是哪位领导人想起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夷制夷的策略，于是派人到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把该校八一八红卫兵组织的一个头头邓北生请来了。

邓北生是邓发独子，邓发遇难时，北生只有两岁。

邓发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位传奇人物。我最早读到邓发的名字是美国作家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当时邓发安排接应斯诺去延安，路上，当邓发把名字告诉斯

诺时，斯诺的脑袋像要炸开一样。他在漫记中写道：“邓发？邓发……哦，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而且还有，悬赏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后来父亲在跟我谈到邓发时说，邓发在香港搞地下工作时，就常常在警察局门前开会。特务们盯梢他时，他带着那顶法兰西小帽，两手各抓一支酒瓶，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走。特务们知道邓发武功好，都不敢轻易下手，邓发往往能寻机脱身，化险为夷。

邓发是广东云浮人。在苏兆征的启发下，很小就参加革命。他参加过 1922 年香港海员大罢工和 1925 年省港大罢工，1927 年参加了广州武装起义。后来他在闽南领导游击战争，1931 年来到瑞金中央苏区，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王稼祥、项英、顾作霖等八人组成苏区中央局，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长征途中，他出席过遵义会议，投了毛泽东一票。1937 年邓发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抗日战争期间，邓发从新疆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兼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抗日战争胜利那年，邓发以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主席的身份出席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世界职工代表大会。1946 年初，邓发从国外回到重庆，4 月 8 日，他与王若飞、秦邦宪（博古）、叶挺等乘美国一架运输机飞回延安，在山西省西北部黑茶山撞机坠毁，成为著名的四八烈士之一。

邓发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领导人，但由于太过忠直，又受到当时极“左”思潮影响，他在任中央保卫局长时，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也错捕、错杀了许多人。在延安整风期间，许多人提出要清算他，致使他在中共七大上连中央候补委员都没有被选上。

两年前，在一次聚会上，我向北生大哥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你父亲还活着，他的命运会是怎么样呢？”北生不假思索，直截了当地说：“肯定很惨！”“为什么？”“接父亲保卫局长班的是康生，康生的下场如此，我父亲还活着的话，比他更糟！”北生这样分析说。

……北生把我叫去，很严肃地对我说：“现在北京一〇一的红卫兵日夜在冲击省委机关，你立即回校组织人马来这里保卫省委。”我说：“没问题！保省委就是保爹。要造反也轮不到他们来反。”我立即回校组织了二三十人，其中包括省委书记区梦觉女儿区惠风，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汉兴女儿李小玲等人开进省委。下午我们在省委五楼的大门和卫兵及工作人员一起，成功地拦截要冲进大楼的

一〇一中学的红卫兵，与他们发生激烈的肢体接触和口水战。记得那时一旦冲突，对方首先气势汹汹地质问：“你是什么出身？”我们有力地回答：“革命干部！”

“三代贫农！”对方见我们回答坚定，又都穿着黄色的旧军装，扎着宽大的老式牛皮武装带，戴着红卫兵袖章，不免有所顾忌和收敛。

晚上，根据一〇一中学红卫兵点的名，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在五楼旁的小礼堂集中，准备接受审讯。小礼堂中间摆放了一条长桌，靠东面一排凳子上坐着的是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书记处书记李坚真、区梦觉、林李明、尹林平，候补书记张根生、张云、李子元等人。靠西面的一排凳子上坐着五六名一〇一红卫兵的头儿，后面站着十多名手执武装带和短棍的男女红卫兵。我领着二十多名华师附中南海红卫兵则站立在省委大员们的身后，大家一字排开，气氛相当紧张。

“审讯”开始了。一个头儿站起来，向这些接受审讯的书记们大声吼道：“你们统统给我自报家庭出身！”我一听，没戏了，他们又是在搞血统论这套，心里反而踏实了。书记们你看我，我望你，相对而笑，个个都不说话。

头儿急了，指着坐在对面的老红军李坚真的鼻子问：“你是什么出身？”李大姐淡定地回答：“贫雇农。”头儿反应很快，马上回了一句：“那你是贫下中农的叛徒！”

“那你呢？”头儿又指向尹林平，他坚定地回答：“贫农！”

头儿转过脸去，对着第一书记赵紫阳喝道：“你叫什么名字，什么出身？”“赵紫阳，富农出身。”“好哇！你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头儿终于感到抓到稻草了。大概他没听清赵紫阳用浓厚的河南话报出的姓名，头儿的嗓门提得更高了：“赵纸篓！你必须老实交代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赵紫阳也不示弱，提高了声调反驳说：“我是赵紫阳，不是赵纸篓！我没有反对毛主席！”对面一排红卫兵立即解开武装带，黄铜做的皮带扣在灯光下一闪一闪地泛着金光。他们要准备动手打人了！

我一看也迅速作出反应，大声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二十多人也立即解开武装带，做好随时应战的准备。对方一看，我们人数比他们多，加上在小礼堂外面还有邓北生组织的机关干部在策应，于是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这一晚，我们双方虽僵持良久，但北京一〇一中学红卫兵终于无所作为，领头的憋了半天才丢下一句话：“明天你们每个人都要交一个检查给我们！”

这伙人灰溜溜地撤离了，省委大员们终于免除了皮肉之苦。那天晚上一直搞到半夜，省委饭堂还煮了鸡蛋花糖水，蒸了馒头来犒劳我们。

摘自杨小村著《我与一个时代的握手》，香港伟确华粹书务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版，第四章“文革浩劫（一）”标题和小标题都是本刊另拟的。

【文摘】

有关邱会作的三本书

何亮亮（凤凰卫视执行总编）

解说：香港的北星出版社和新世纪出版社在今年出版了一系列关于邱会作的作品，其中有他的回忆录，还有他和儿子的对话，让读者再度走进那段动荡的岁月。邱会作是江西兴国人，1914 年出生，15 岁参加红军。1955 年，邱会作被授中将军衔，后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并担任总后勤部部长等职务，曾是林彪“四大金刚”之一。

1971 年“9·13”事件后，邱会作被拘留并开除了党籍、军籍。1980 年，邱会作被当作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 16 年徒刑，其后保外就医，晚年一直生活在西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分上下两册，是邱会作的儿子程光与父亲多次对话的详细记录。

《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与若干历史问题》（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共 25 章。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邱会作回忆录》上下两册，分为 4 篇 46 章，4 篇分别为战斗的历程，军队建设的征程，人民军队忠于党和我的晚年。作者从 1982 年开始，在艰苦的环境中开始撰写回忆录，为时近 20 年。

这三套书包括了大量的见闻、思考和珍贵的照片。对于了解和研究中国当代历史、中共党史和解放军军史都有重要的价值。

“时事亮亮点”第一期介绍了《吴法宪回忆录》，林彪手下有所谓的四大将，就是黄、吴、李、邱，现在这四大将，虽然他们都已经离开人间，已经去世了，但是他们都有回忆录，或者是由他们子女所写的著作出版了，所以给我们留下很多的史料。有关邱会作的这三本书，《回忆录》是他自己的回忆。这位老将军在他保外就医之后，在人间还度过了二十几年的岁月，这二十几年岁月里面，他记忆力非常好，他不仅自己写，而且他跟他的儿子程光有大量的谈话，邱会作的儿子也很有心，每一次都把他跟父亲的谈话记录下来，于是就有了《心灵的对话》和《历史的回顾》这两本书。《心灵的对话》讲的就是文革，包括邱本人挨斗、坐牢以及他的反思。

这些书我觉得对于研究中国的历史、中共的党史，还有解放军的军史，特别是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我从里面也看到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资料，比方说邱会作他讲到解放军所谓“山头”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其实不是很多，但是熟悉中国历史或者是解放军历史的人都知道。邱会作说解放军有三大山头，就是红军的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三大山头的将领，其战功基本上也就这个顺序，就是一、二、四方面军。三个山头的代表人物分别是彭德怀、林彪、贺龙和徐向前。在实力方面，贺龙是可以跟林彪抗衡的，因为贺龙手下很多，而且贺龙非常善于团结人，我觉得邱会作已经是超越了自己，因为他是一方面军的。邱会作说，他们是嫡系的嫡系，“双一”就是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红一方面一军团那些人都是能征善战，而且全都是林彪手下的战将。

作为一方面军的老人，邱会作能够超越历史，超越山头之间的恩怨来看待历史。他讲到，比方说在 1958 年彭德怀是当时国防部长，彭德怀下台之后，彭德怀手下的徐海东也生病了，原来彭德怀山头的三军团和 15 军团的这些将领都被贺龙收归他的门下了。邱会作说，贺龙很会做团结的工作，他有句这样的话叫做茅台酒胜过党性。

在讲到历史问题山头的时候，邱会作也讲到四方面军，因为他是见证人，他们这些人经历了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邱会作在讲到当年红四方军干部“出走事

件”的时候，他说看来当时中央对四方面军的政策是有问题的。张国焘在四方面军里面是很有威望的，这都是他的原话。

另外还讲了一些就是史书上完全没有记载的事情，比方说邱会作说，他担任总后勤部部长之后，彭德怀已经下台了，结果他很惊奇地发现，原来彭德怀截留了 70 亿元的军费，这个军费就没有使用。彭德怀当然不是贪污的，彭德怀是很清廉的，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彭德怀就截留了 70 亿军费。邱会作就向毛泽东报告了，毛泽东是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了这个钱应该还给国务院。但是怎么还给国务院呢？连财政部的几个部长副部长他们都觉得这种时机（国家经济困难），军队怎么还有 70 亿的军费多下来了，那时候 70 亿可是一笔极大的数字。后来还是邱会作和周恩来一起商量，很妥善的把这笔钱还给了国务院。

邱会作作为总后的部长，他也见证了 1959 年到 1961 年的“三年灾害时期”，我是第一次看到军队的高级将领，以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在谈这种问题。比方说，他在广西就了解到，单是广西就饿死几百万人。

讲到 1961 年的冬天，当时空军报告说在甘肃的河西走廊发现了异常的情况，就是河西走廊那样一个狭长的地带，居然就没有什么人烟了，连炊烟都没有了。后来周恩来得到这个情报之后马上派人去调查，发现当地也是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饥荒的情况，很多人饿死了，而且社会近于失控。邱会作对于三年的灾难，他也是有反省，他认为人祸多于天灾。

讲到中美关系的时候，虽然邱会作的回忆中讲到这种国际关系的并不是很多，但是他讲到了实际上是从 1969 年的下半年开始，1971 年的上半年毛泽东就在集中精力研究国际问题，研究整个国际战略的格局，而且已经就开始酝酿，要联合美国来制约苏联，同时邱也澄清了人们的一些传闻。当时有传闻，也有这样的文章说，林彪是反对中美和解的。邱说不是这样，他说林彪不仅是完全支持毛泽东中美接近的战略，而且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的时候，就提出要见林彪，但是因为当时林彪在北戴河，所以也没有见成。

这里也讲到了，林彪还有一段这样的传闻，就是斯大林很赏识林彪。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据邱会作说是刘亚楼，因为刘亚楼是中国空军的创始人之一。刘亚楼当年（二次大战时期）在苏联，这是刘亚楼后来向解放军高级将领透露的。林彪在苏联养病的期间，当时德军可能要入侵苏联，斯大林召开了一个苏

联的最高国防会议，把林彪请来，而林彪就预测，他说德军如果进攻苏联的话，很可能向列宁格勒、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三个方向来发动进攻，后来果然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斯大林对林彪非常欣赏。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书里面讲到，像 1970 年 9 月的庐山会议，这是中共党史上，也是文化大革命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庐山会议上很明显的就是毛泽东已经对林彪不信任了，准备要搬掉林彪。这里面的一个细节，是回忆录讲的，9 月 7 号，林彪下山了，周恩来去看望林彪，两个人紧紧握手，面面相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林彪的这四个大将，黄、吴、李、邱都到九江为林彪送行，林彪对他们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照常工作，最多是“彭德怀第二”。你们有事要多向周总理请示报告。以后林彪就和他们很少联系了。

非常有意思的就是王洪文这个当年的上海帮的首要分子之一，也曾经当过军委常委的，邱会作后来跟他在秦城监狱重遇了，邱会作讲到王洪文的一些情况。王洪文说，其实毛泽东去世之后，“四人帮”是非常松散的，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华国锋会用非常的手段来对付他们，另外我们看到《心灵的对话》第 886 页，讲到王洪文的这段有一半是全部被删节了，这里面讲到王洪文在监狱当中受到的酷刑。王洪文 50 多岁就死了，所以跟这个应该是有关系的。

这本书里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讲到了军委办事组的作用，军委办事组是 1967 年 9 月 26 日，由毛泽东提议建立的。之前的军委办事组就是军委里有四个人在负责，杨成武、吴法宪、邱会作和张秀川，到了 1968 年 3 月，毛泽东提议，因为那时候杨成武被打倒了，毛泽东提议成立一个军委的办事组，让黄永胜来负责，就用了黄、吴、叶、李、邱，就包括叶群，然后再加上温玉成和刘贤权，毛泽东说，“今后军委的工作办事组就由林副主席直接管，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用开会了。”

而林彪就说要把总理交办的事情当作军队自己的事情去办，到了 1969 年的“九大”，黄、吴、叶、李、邱和李德生进入政治局。按照邱会作的说法，就是军人从政了。因为这个时候军委办事组的成员进入了政治局，军委办事组也就是文革期间的军委，在这个军委办事组主持军队工作期间，第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军队没有乱；第二、军队跟周恩来紧密的配合，也保持了国家经济建设

在很困难的情况下还能够继续建设。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比方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就是在林彪主政的时候就开始研制成功了，所以总的来讲，邱会作这三本书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资料。我相信所有的读者在阅读这三本书的时候，都能够看到很多官方史书上没有记载的东西，而且我相信它们大体上都是可信的，是真实的。

摘自凤凰网，本刊略有删节。

【博客文选】

泉州也有一处红卫兵公墓

泉州李四

去年我和朋友们创办“刺桐红文革历史展览馆”，就将“重庆红卫兵公墓”作为武斗的一个重要内容加以展示。当时“重庆红卫兵公墓”尚未被评为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我根据所掌握的资料，也倾向认为它是全国仅存的红卫兵公墓。让我没想到的是，“刺桐红文革历史展览馆”开馆后不久，有一位观众告诉我：其实咱们泉州也有一座红卫兵公墓！这话让我心里一惊：果真如此吗？



(左图：公墓前典型的纪念碑，碑顶是象征革命造反精神的火炬造型。)

刚开始我有些怀疑，但见他言之凿凿，不由得不信。此后，寻访“泉州红卫兵公墓”的念头一直藏在心里。2010年2月6日这一天，我终于找机会和馆里的小傅一起，带上相机，根据那位观众所说的大致方向前去寻找。

或许冥冥之中有某种指引吧，我和小傅很快就找到了“泉州红卫兵公墓”的所在地——泉州清源山下齐云路82号厂房对面的一处墓地。

泉州“八.二九”红卫兵公墓共有十三座陵墓，最前面的墓主人是杨化民，后排自左至右依次为陈天赐、黄世锦、傅成柱、周颂三、杨晋发、吴思南、庄一宾、陈孙杰、林自强、黄琼树、陈仰朝、张淑卿。



每座墓的墓碑都有“八二九××战士”的字样；墓下面都有简要的文字说明文字：

杨化民同志 一九四二年生泉州东海公社，共青团员，一九六〇参军，一九六三年复员在泉州塑胶厂工作，文革中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光荣牺牲。一九七一年元月十八日立

陈孙杰烈士 共青团员 八二九五中兵团负责人 生于一九四七年十月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七日在反抗极左的斗争中执行任务时因公殉职

傅成柱烈士 共青团员 八二九晋司七一六创始人和主要负责人 生于一九五〇年 一九六八年八月六日在运输总站保卫战中 为保护国家财产被张修御用工具枪杀

张淑卿烈士 八二九工人泉□兵团战士 生于一九五一年六月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为捍卫九五命令 参加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誓师大会 游行时遭张修御用工具杀害

周颂三烈士 八二九工读兵团毛泽东思想宣传员 生于一九四四年八月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惨遭张修集团无辜杀害

其他比较完整的说明文字还有：

1、陈天赐烈士八二九农民池店分部战士共青团员旧铺牧场贫协主任文革主任生于一九四七年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九日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被张修梁宋陈之流无辜暗杀于华洲

2、黄琼树烈士省五建 113 战士生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为捍卫九五命令遭受张修御用工具枪杀于大坪山

3、陈仰朝烈士八二九晋司勤务组成员八二九五中兵团负责人生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六七年秋赴京汇报归途中为捍卫伟大长城于榕城遭叶侯死党枪杀

4、黄世锦烈士共青团员八二九工新食品兵团战士生于一九四八年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光荣牺牲

5、林自强烈士八二九华大战士生于一九四二年一九六七年十月三日前往安溪调查时惨遭张修之流无辜杀害

6、庄一宾烈士八二九五中兵团战士生于一九五年七月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
在晋江石狮□□战中为掩护战友遭张修梁宋陈之流杀害

墓地虽然杂草凌乱，但仍可见有祭拜过的痕迹。



墓地总面积约 140 平方米；墓地前面的底座及字迹已经损坏。

墓地前有一条路通往清源山上。

“泉州红卫兵公墓”相较于重庆红卫兵公墓，规模当然较小，但它同样具

有突出的文革史料价值，是研究泉州文革历史不可多得的重要物证。因此我们呼吁泉州市政府有关部门抓紧采取措施，进行修缮保护。如果能像重庆市政府那样把它定为泉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当然更好。同时，我们也希望有关知情者能积极提供线索，和我们一起进一步厘清该公墓的来龙去脉，相信这对于告慰逝者亡灵，反思文革历史教训，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原文以下还附有“刺桐红文革历史展览馆”所收藏的两篇有关文章。一篇刊登在 1969 年春节《泉联战总》报上，系为纪念“泉联战总死难烈士”而作，题为“你们的光辉形象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间”；另一篇是“泉州红卫兵公墓”中死难者傅成柱的遗作，刊于 1969 年 3 月 24 日泉州（时为晋江专区）《八二九》报上，题为“雪虐风饕愈凜然”，略。

【简讯】

[《清华蒯大富》一书在香港问世](#)

[穆 汀](#)

2011 年 3 月，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隆重推出《清华蒯大富》一书。此书作者“许爱晶”是笔名，其实他是当年人人皆知的首都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与蒯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其在“后记”中称，他与蒯相识 45 年，“虽思路各异，但命运相连”，他“对蒯大富的了解之全，了解之深可谓无人可及。”而写作此书，对文革、对蒯大富、对他本人做一认真交待，是他多年的宿愿。

据作者透露，他“握有大量的无可替代的文革史料”且有着亲闻当年中央高层的言论，亲历当年高层政治场景之难得的经历。因此，他具备了再现历史的条件。而忠于事实——“对书中所述的每一个时间、地点及人的言行重新做严谨的考证”，是他写作此书的最重要原则，也是此书的最大特色。

全书二十六章，从想当科学家的少年蒯大富写起，用了二十二章的篇幅，讲述了文革之初，蒯大富在清华大学率先造校长蒋南翔的反、质疑工作组而被打成

反革命，在毛泽东的第一张大字报后，拉起队伍造反，批斗王光美，搞派性武斗，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落马，被捕入狱以及公堂受审的全部过程。此书的后三章叙述了刑满出狱后的蒯大富创业、娶妻生女的故事。最后一章，以蒯大富对文革的反思做结。其完整、详实相当于一部《蒯大富评传》。

此书是香港出版界的新秀，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继《文革检讨书》之后，推出的一部重要作品。装帧精美，附有多幅照片。虽属鸿篇巨制，但售价仅 138 元港币。

【简讯】

文革研究的美术向度

——考史堂～文革资料研究交流中心在京成立

朝 代

以文革美术印刷品及其他各类出版物的整理、收集为主要工作，以物证史，致力于探讨文革起源及近代中国的社会史、生活史、心灵史的民间研究机构“考史堂～文革资料研究交流中心”，于 2011 年 5 月 22 日在北京成立。

近年来，越来越多资料被挖掘整理出来，文革研究趋向深入，文革研究的向度，也将逐渐由单一的政治-权力斗争的揭秘，逐步趋向于多元。文革的成因及其背后更加广阔的社会背景、历史背景尚有待探讨，而经济向度、文化向度、科技向度乃至社会史、生活史、美术史和心灵史向度的文革研究，目前的整理、梳理工作还远远不够。

美术向度的文革研究国外开始的很早，比如，在伦勃朗和梵高的故乡荷兰，很早就成立了专门研究文革美术的“文革宣传画博物馆”。不少的海外博物馆、大学及研究机构多年来也广为搜集相关的文革艺术品。大量中国当代艺术中文革符号与元素的广泛运用，和西方人对此的持久兴趣有直接关系。

西方对文革美术持久的兴趣，既证明了美术具有跨越语言障碍的影响力，同时也证明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有效的宣传工具，文革美术确乎在技巧上、在形式上、在其有效表达与传播的亲合力上，有其独到之处。

招贴画，尤其是现代意义上的招贴画（主要是宣传画，新年画等），是一种

随着现代出版印刷而诞生的大众美术形式。宣传画、年画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可以通过印刷复制以低廉的价格送到观众手中。普及的目的决定了印刷品的巨大印数和低廉售价。作品还能附印在发行量很大的报刊杂志上进行传播，或印成单页大量出售，供私人空间或公共空间张贴，或印刷成册页或画册，供爱好者收藏。

在共和国建政初期的年代里，对于一般民众来说，作为招贴画常见形式的宣传画、新年画，是其日常所接触到的最常见最主要的美术形式。它和民众有着极大的天然亲和力。年画和宣传画都是用于张贴的，可以兼用图画、口号、文字、摄影以及电影、戏剧照片等手段。水粉、水彩、版画、剪纸、油画、工笔画、水墨画，甚至雕塑、摄影，都适合制作成年画和宣传画。许多著名艺术家都从事过年画和宣传画的创作。

在其盛行的年代，宣传画、新年画（指被赋予了新的形式，用来表现新内容的，由专业美术工作者所创作的年画，以和传统的年画相区分），通常都张贴在居民家里或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居民用它来美化居室，或增加年节气氛。而政府则把它用来宣传与教化民众，用它来统一思想，形成社会观念的一致和共识。这种墙上张贴的，由专业美术工作者创作的大众美术，从共和国建政初期开始，逐渐取代了过去流行的月份牌广告画以及旧内容旧形式的年画，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美术形式。自然，它也成为无处不在的宣传媒介。

作为一个重要媒介载体，招贴画被用于宣传政治及政策，在中国是从民国初期开始的。随后，在当时共产党人统治的根据地，为了更有效地利用这种大众美术，使其成为宣教工具，这一艺术形式被进一步开发并彻底地改造。

中共建政以后，非常注重对社会的有效整合与积极引导，而这种引导与整合，则须借助有效的媒介才能达成。在中共掌握的各种媒介资源中，通俗直观的宣传艺术品，如宣传画、新年画等，是非常有效的宣传工具。

毛泽东眼中，文艺具有启蒙的作用。不过，与法国启蒙运动不同的是，毛泽东要启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兵，而不是崛起的中产阶级。为了宣传中共的政治方针及社会政策，文艺，特别是图像艺术，是最佳的手段。它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加载上政治内容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由于中共领导下的文艺的对象主要是文盲或识字不多的农民、工人、士兵，创作要求以普及为先决条件，所以作品必须直观、明白，而且能够大量复制。故而，适应当时政治需要的

宣传画，以及年画、连环画成为流行的艺术形式，它们对大多数是文盲又讲着各种方言的群众来说，是非常有效的。

毛泽东十分重视大众传播，认为这是发动革命运动必不可少的舆论工具。为了反修防修，贯彻继续革命的思想，他动用红卫兵等群众组织及其非正规的媒体手段，如大字报、小报、文艺表演以及广播宣传，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诉诸视觉的大众传播工具中，最受重视的美术形式就主要是宣传画、年画这类招贴美术。

由于文革美术作品是当时宣传、教化、引导、组织民众，以及打击、整肃敌对势力的重要媒介载体，所以，在其内容与形式中，承载和保存了大量了解及解读文革与近代中国社会及历史的宝贵信息与资料，亟待挖掘整理。

生于文革爆发次年，身为作家、艺评人、策展人，中国近现代美术的研究者和收藏者，考史堂主王宇清先生，把宣传画视为“身体美学”和“政治美学”的重要载体，对从辛亥到文革半个世纪之间宣传画反映出的文化断裂颇有心得。他认为：文革研究的向度由单一的政治-权力斗争揭秘逐步趋向于多元，而经济、文化、科技乃至社会史、生活史、美术史和心灵史向度，梳理工作显然远远不够。外国人对文革美术怀有持久的兴趣，既证明美术具有跨越语言障碍的影响力，也说明作为意识形态的有效宣传工具，文革美术在技巧、形式、有效表达与传播方面确有独特之处。至于中国当代艺术中出现大量文革符号与元素，屡创天价，显系按照西方口味定制的美术商品。

据悉，王宇清先生之前已三次在北京各个艺术区开办此类画廊型艺术沙龙，均因各种原因夭折。考史堂已是第四次尝试，可谓屡败屡战。

考史堂开业当天的宣传画展览主题是：1915-1975，新妇女和新少年。展出从“美人图”到“铁姑娘”的一系列画作。今后，该中心将不定期举办各类主题展览并做相关研讨。当天的研讨会上，刘自立等来宾就文革近期研究进展、文化革命的传承及该中心的生存模式做了发言。有兴趣者可访问考史堂网址：www.chaodai1967.com。

【书评与序跋】

绝版的价值

——《清华蒯大富》自序

许爱晶

笔者声明：本书是众人劳动的成果。本人尝试用“还原加讨论”的方式研究文化大革命典型人物蒯大富和文化大革命初期清华大学的政治斗争。本书是学术性的，本书不是演义，更不是小说。本书与那些用真名实姓演义故事的书泾渭分明。

在中国，一本《红楼梦》，可以产生一个“红学”。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必然产生“中国文革学”。而“中国文革学”的研究规模和重要性远在“红学”之上。

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和研究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某一段历史一样，必须首先搞清历史真相。然后在此基础上总结社会演变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供后人参考，让后人少走弯路。

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还有人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也有人说历史是人民写的。

笔者认为历史书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常常由胜利者来写成。但历史过程中当事人的真实言行，包括当时的真实想法是无法改变的。史实不容打扮也不由胜利者斧削。历史真实只有一个，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终究要说话！

从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十余年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开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中有若干重大事件和若干重要人物必须研究。本书介绍文革重要

人物之一蒯大富，并把文革初期清华大学政治斗争的真实场景还原给有兴趣的读者。

蒯大富是被国家主席刘少奇当靶子打的一号学生反革命，也是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平反的一号学生造反派。清华大学是毛泽东实现其政治主张的一个重要阵地。研究蒯大富及清华文革是文革史的经典课题之一。

在文化大革命中，蒯大富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负责人、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蒯大富特殊的经历和影响是文革研究者无法回避的，他的成败教训无论对学者还是对后代青年都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本书详略有异地展示了蒯大富、王光美、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以及江青、张春桥等人在不同处境时的所作所为。

文革开始时，蒯大富作为一个普通大学生，他用文字和言论质疑工作组，这完全属于合法行为。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领导工作组发动万人围剿蒯大富，关他禁闭，限制他的人生自由。面对排山倒海之压，蒯大富孤身抗战，被迫绝食抗议，可谓气壮山河！这是中华民族争取人权、争取民主的历史进程中的经典案例。

沧海桑田，1969年11月12日，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病逝河南开封。刘少奇失去人生自由，被开除党籍，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在这一系列过程中，我们是否经过严格合法的程序，刘少奇正当的公民权、申诉权是否得到保证？对此做全面严肃的检讨，这同样是中共党史和中华民族法制史上的经典案例。

文化大革命前，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也曾经拿着党章和宪法向中央会议要求发言权，这是为什么？惊天案例岂容忘却！

历史人物的经典篇章往往是在身处劣境之时，而得意之时或得意之后往往留下败笔。本书人物众多，蒯大富之外最精彩的应该是王光美。

王光美整蒯大富之后不久，斗转星移。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调动雷霆万钧之压，王光美落入蒯大富手中。王光美在三十多万人的批斗大会上遭受不堪之辱，被王光美整得死去活来的清华井冈山战士当面审问她，可以说是因果相通。但细看王光美面对民众声讨写出的检查和对义愤学生的应答，不得不承认身陷逆境的她政治原则性之强、智慧之高、语言之周圆。反映出王光美确有超群的才华，这同样是经典不凡的篇章！

及至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天崩地裂！文化大革命宣告失败。在1980年底，庭审张春桥时，蒯大富出庭作证。特别检察厅规定蒯大富的证词不准提党中央，不准提毛主席，只能提张春桥。他们对证词反复修改，改到一个字都不能动，要蒯大富背诵一百遍。连语调动作都设计好，排演多次。开庭时向全世界转播蒯大富的表演图像，暴露执法者的无聊与虚伪！正派之人视之，无不痛惜蒯大富形象和人格跌落到人生最低谷！

回首翻天覆地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人权与民主的问题上，我们希望真能看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局面。当然前提是立法本身要民主，法律本身要维护绝大多数公民的权利。悲剧不容重演，当权者更应深思！在人权、民主、法制方面搞双重标准的人是要受到惩罚的！

历史研究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读者和笔者对历史的认识既有差异又在变化，是非成败另当别论。当事者回首过去应该首先到自身找原因并勇敢承担责任。

对于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无论是真心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还是主张在中国推进西方民主的，都应从本书展示的历史真实中找到在中国推进民主政治的经验教训。

本书展示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清华大学的政治斗争。请注意：从1966年7月28日北京市委决定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到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遣宣传队开进清华，整整两年，虽然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团派占有诸多优势，但根本就没能一统天下，清华没有建立起合法的、有权威的权力机构。到本书初版中共已执政62年，唯有这两年清华处于党政领导缺失状态。在清华大学建校100年内，仅此两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权力真空”。

这两年里，清华校园处于无政府、无权威的状态，这里的中国公民享有极端民主的权利。学生、教师以及工人和干部们基本不上课、不生产也不上班，随心所欲地在校内或北京街头召开会议、演说、游行，他们张贴大字报、搞广播宣传、印刷传单报纸，随处散发，甚至可以跑到外省市去搞同样的活动，串联成立组织，向当地党政机关和领导人发起批判斗争。

在清华这个最高学府里，师生们想法各异、志向不同。一万多精英在这个小王国里，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为了取得清华大学的领导权，各聚山头、打派仗，不择手段，最终激化为百日武斗。这两年里，高等学府清华付出了惨痛代价，蒯大富更是身败名裂！回首这两年，不能仅仅痛心痛惜。

清华园付出惨痛代价的这两年，其政治生态实属罕见，可谓绝版！这里成了中华民族民主政治最典型、最生动的试验场。因此，这两年清华大学的校园史有绝顶的研究价值。清华文革初期派别斗争最后演变为百日武斗，说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有人甚至认为若干年后台湾岛的蓝绿斗争、泰国红衫军和黄衫军的某些斗争场面早在1967年、1968年清华园就上演过了。

任何历史阶段，在一个社会区域里，人们的利益和主张千差万别，都想各抒己见、各行其是。那么怎样才能让千万不同个体的智慧和力量在纷争的情况下形

成健康的建设性的合力呢？怎样才能避免无谓肮脏的政治对抗给社会造成的不必要破坏呢？我们应该从清华民主政治试验场找到答案。

清华大学文革阶段复杂残酷的政治斗争，不仅对当年师生员工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更重要的是它影响着后来的中国社会变革。文革时，胡锦涛、吴邦国、吴官正、刘延东以及贾春旺等人都在清华。而习近平是1975年在文化大革命尾声时进清华大学化工系学习的。

这两年清华的斗争是在文化大革命旗帜下解决文革的矛盾。真心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人们，应该研究在一党为主、多党合作的政治统治下怎样避免当权派把公权变为私权、怎样避免专制者唯我独尊、罔闻民意，研究怎样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而不是沦为任其指挥的愚民。至于那些主张在中国推进西方民主的人们，回头看看清华精英们在享有充分民主权利情况下的斗争，也可以从中寻找办法，研究在中国怎样避免出现少数权力资本操纵的弱肉强食的假民主，怎样避免出现金钱民主、贪腐民主和混战民主。我们要从清华文革派性斗争中总结出推进大陆民主政治的宝贵经验和教训，从中悟出治国安民的大道理。因为这样的社会实践和试验在中国大陆太罕见了。

我们要在中国实现绝大多数人占有绝大多数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基础上的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我们要创造优于西方、高于过去的崭新的中华文明。

书中对文革时身在清华的胡锦涛只一句带过。但不得不承认，胡锦涛先生签名的“大字报”所反映的思想方法牵动文革矛盾之根，他此后不再介入文革反映其处境也反映其定力。

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社会课题，本书展示与研究的是文革中的特定课题。无论还原文革中的一个“人物”或者还原一个“事件”，除了情节必须真实之外，还必须

还原文革的灵魂，这就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的理论。如果不深刻理解毛泽东理论就去讲文化大革命，可谓画龙无睛，做人无魂！

研究伊斯兰国家历史的人必须熟读并深刻理解《古兰经》；研究基督教民族历史的人必须熟读并深刻理解《圣经》。要研究文化大革命，就必须下苦功研究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只有这样，还原的才是原汁原味、原色原状的真文革。笔者尽量用毛泽东文革理论去分析文革中的人和事。本书力图让读者完全进入到文革真实中去感受和研究。

有些自称民主派和自称左派的人从不同角度表述和评价文革，遗憾的是很多人对当年文革真实情况知之甚少，甚至信口开河！他们说的文革不是真文革、他们说的毛泽东不是真毛泽东！

关于毛泽东是非功罪的争论三千年后还会继续。但毛泽东主张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人民性让反对他的人永远打不倒他。毛泽东主张人民拥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严格监督当权者并全方位地直接参与社会管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毛泽东都是伟大的历史巨人。

毛泽东对清华大学的关心，一直延续到生命的最后岁月。1975年毛泽东支持迟群和谢静宜并批评刘冰和邓小平。当年毛泽东支持迟群和谢静宜，并不是支持他们身上的毛病。毛泽东是坚持自己在教育战线的政治主张和办学方向。因为清华最能代表中国教育的方向，也最能代表中国的未来。中国向何处去？要看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培养人！毛泽东逝世，迟群照样落得被判刑的结局。从全局看，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包括在教育战线的失败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应当另作他论。

早在1964年春节毛泽东谈话就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

对。课程太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这几方面都要改。

1964年到2011年已经过去四十七年了。教育改革问题不但没解决，反而越来越糟糕。目前学校培养人的方向和方法都存在严重弊病。

行笔至此，不妨看看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曾被划为大右派的钱伟长先生关于教育的言论：我们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家。

综观当今，表面可见到发展繁荣而内里滋生腐败。钱伟长先生这种正确的教育思想似乎已经被视为脱离实际，毛泽东理想主义的教育思想更被当作是天方夜谭。当今教育战线、文学艺术战线、整个上层建筑的问题是极其严重、极其危险的。无情的现实必将影响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如果社会和学校培养的大部分学生只关心自己，只想升官发财成为掠夺者，让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加速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哪里会有真正的人权，哪里会有真正的民主！如果再不认真重视教育问题，再不解决学校培养人的方向和方法存在的严重弊病，社会前景堪忧！

笔者尝试还原绝版的历史人物蒯大富和绝版的清华文革真相，研究人权、研究民主、研究文化教育，总结教训，共同探寻中华民族光明之路。希望我们的学校包括清华大学真正培养出一大批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出一大批保护地球资源、根治环境污染、善于解决复杂矛盾、主持社会公道的栋梁之材！

民主、民主，人民要在经济上政治上真正当家作主！执政、执政，永远不允许对民众专政！任何政党和政府违背这一点都是反动的！

愿中华民族不断进步，愿社会更美好，愿人民更幸福。

笔者谨以本书恭贺清华大学建校一百周年！

二〇一一年元月六日

【故纸堆】

按：这样的旧闻，如今读起来比许多新闻还觉新鲜。1967年6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其实也就是毛泽东、周恩来等极少几个人）的决定，中国红卫兵代表团赴阿尔巴尼亚访问。除毛泽东、林彪以外，自“三号首长”周恩来以下众多党政军要人都到机场送行，可见场面之壮观。可是如今还有几人记得当年这个所谓的红卫兵代表团有哪些“代表”？姚文元在当年8月2日“欢迎中国红卫兵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胜利回国大会”上的报告中说：“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中国红卫兵代表团由北京和上海的红卫兵代表组成。除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外，并有北京工代会代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青年战士参加。”由此可知这个红卫兵代表团里并不都是红卫兵。这篇报道公布的代表团成员名单中，谭厚兰是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师大井冈山公社负责人、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刘锡昌是北京光华木材厂工人、北京工代会核心组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陈敢峰是上海同济大学学生、同济东方红兵团负责人、同济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程金香是清华附中学生、北京中学红代会核心组成员；宋义民、高静慧的身份则不详。望知情者能提供相关信息。

[我国红卫兵代表团离京前往地拉那](#)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刘宁一江青萧华杨成武等同志到机场
送行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 应邀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在团长姚文元同志率领下，二十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地拉那。

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团员有：谭厚兰、刘锡昌、宋义民、陈敢峰、程金香、高静慧。

到机场送行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刘宁一、江青、萧华、杨成武、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赵毅敏等负责同志。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工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的负责成员和代表聂元梓、丁国钰、王老民、鲁文阁、戴宝元、李龙河、林晓芒、王群、李冬民、陈永康，以及首都红卫兵二千多人。

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馆参赞巴巴尼也到机场送行。

中国红卫兵代表团的成员们，胸前佩戴着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手捧红彤彤的革命宝书《毛主席语录》，精神抖擞，生气勃勃。当他们同周恩来等同志来到机场时，红卫兵小将们高高举起毛主席像，挥动一面面红旗，敲锣打鼓，长时间地有节奏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恩维尔·霍查同志万岁！”请代表团把中国红卫兵和革命青年的战斗友谊，带给兄弟的阿尔巴尼亚战友们。

【编读往来】

1、卜大华澄清王任重与《造反精神万岁》的关系

《记忆》第六十八期《编读往来》中《周七月谈王任重与红卫兵》一文提到三论《红卫兵造反精神万岁》有王任重参与，并说经我证实。此事与事实不符。

三论《造反精神万岁》是分别写于1966年6月24日；7月4日；7月27日的三篇大字报。当时用的题目是《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三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公开发表时，在“革命的造反精神”前加上了“无产阶级”的定语。但从未用过《红卫兵造反精神万岁》的题目。

1966年7月28日，海淀区在北京展览馆召开揭发批判工作组大会。在会上发言的清华附中学生代表骆小海、邝桃生将前两篇大字报的抄件交给了在主席台

上就坐的刚刚公开露面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请她转呈毛泽东主席。此前清华附中无人了解中央文革小组是个什么样的机构，更不可能与其有任何联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 1966 年 8 月 3 日第一次在钓鱼台 2 号楼约见我和王铭，清华附中红卫兵才与王任重有了接触。因此王任重根本不可能参与或影响三论《造反精神万岁》的写作。

2、 蒋健谈毛泽东不让江青进政治局

阎长贵先生在《记忆》70 期中对毛泽东不让江青进政治局做的分析考量，很有道理。不过，笔者认为毛泽东还有一个考虑，那就是在试林彪的应手。当时林彪，还有黄永胜等人，对江青不满意，尤其对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做派不满意，毛泽东对此心知肚明。

毫无疑问，当时的江青，无论是在国人中的威望，还是对文革的贡献，甚至资历，都远非叶群可比，可是毛泽东为何要删掉江青、添加叶群呢？难道就是为了照顾林彪吗？至于林彪，当然认为叶群不配，所以删掉。至于江青被毛泽东删掉，他巴不得呢，所以他干脆作壁上观，任由毛泽东再删江青，再加叶群。这不仅给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三人小组出了难题，也迫使毛泽东不得不亮出底牌。

尽管林彪最终顾全了所谓的大局，但那只是看在毛的面子上，到头来几个军头在选举时还是没投江青的票，使江青这个“老娘”自觉大失颜面。虽然毛泽东拒绝了江青查票的无理请求，但他对军头们的心思和做法洞若观火，这对林彪是福是祸焉？